

经济政策：反思与展望

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译者：风灵等

目录

简介.....	3
前言.....	7
第一讲：资本主义.....	10
第二讲：社会主义.....	23
第三讲：干预主义.....	42
第四讲：通货膨胀.....	42
第五讲：外国投资.....	76
第六讲：政治与观念.....	92

简介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理想的经济政策都非常简单。政府应该保护其治下人民之生命与财产，抵抗国内外的侵略，解决所产生争端，使人民能自由地追求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目标和目的。在当今的干预主义年代，这是一种激进的思想。现在，人们常常要求政府管控生产，提高某些商品与服务的价格，降低另一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固定工资，帮助某些企业开业，而阻止另一些企业破产，鼓励或限制进出口，关照老弱病残，支持挥霍无度，等等，等等。

理想的政府是一种看门人的角色，不是人民本身。政府提供条件，让个人、生产者、贸易商、工人、企业家、储户和消费者都能和平地追求其自身的目标。如果政府做到这点，而不再多做什么，那么人民为自己所提供的东西就会远比政府所能提供的更好。这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教授在这本小书里所阐述的真谛。

米塞斯教授（1881-1973）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是《人的行动》，《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等深刻理论著作的作者，并出版了另外十多本作品。然而，在 1959 年阿根廷所做的这一系列讲座中，他以适合于其听众（商务人士、教授、教师与学生等）的非技

术性语言讲授，用平实的例子阐明其理论，从经济原理的角度解释了历史的简单真理，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摧毁欧洲封建制度的等级秩序，讨论了不同类型政府的政治后果，分析了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失败，并展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消费者和工人能够自由地决定自身命运时所能取得的成就。

如果政府保护个人为其欲为之权利（只要不侵犯他人同样行事之同等自由），那么自然而然，人们会工作、合作与交易。然后，他们就有激励去储蓄、积累资本、创新、实验、利用机会并生产。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就会发展。18 和 19 世纪非同凡响的经济进步，以及德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正如米塞斯教授所解释，都得归功于资本主义：

“在经济政策中没有奇迹。你们已在很多报纸和演讲中看到，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德国在二战战败破坏之后的恢复。但这不是奇迹。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应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应用，即使没有完全应用于所有领域。每个国家都能经历同样的经济恢复‘奇迹’，尽管我必须坚持经济恢复不是来自于什么奇迹，它是来自于适用合理的经济政策，是这种政策的结果。”（P15）

由此可见，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限制政府，政府只是创造条件，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与邻居和睦共处。政府的义务只是保护人身和

财产，让人民享有相互合作与交易的自由与机会。以这种方式，政府就能创造出允许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经济环境：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坚持每个人都有权为顾客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服务。而这种方法，这种原则，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它让世界人口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P5）

如果政府的权威和权力超出了这一限度，并且滥用这种权威和权力，正如历史长河中曾多次出现的那样——特别是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以及贝隆治下阿根廷——就阻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并破坏人的自由。

独裁者胡安·贝隆，1946 年被选为阿根廷总统，1955 年被迫离开阿根廷。1959 年米塞斯访问阿根廷时，他正在流亡期间。贝隆的妻子，很受人欢迎的艾娃，早在 1952 年就已逝世。虽然当时贝隆尚在国外，但他仍有许多支持者，仍然是一股需要对付的势力。贝隆于 1973 年回到阿根廷，再次当选为总统，而他的新任妻子伊萨贝尔则是副总统。十个月后，他在任上去世。他的遗孀伊莎贝尔继任总统，其政府被控贪污，最终于 1976 年被赶下台。从那以后，阿根廷又经历了一系列总统的统治，并为改善其经济状况迈出了步伐。生命和财产得到了更大尊重，某些国有产业已出售给了私人买家，而且通货膨胀已经放缓。

本书充分介绍了米塞斯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在《人的行动》及他的其他学术著作中阐述得更为详尽。不过，刚接触其思想的新人从他所著的一些较简单的书籍，如《官僚主义》或《反资本主义心态》等入手更好。有了这样的背景，读者将会更容易地掌握米塞斯在其主要著作中论述的自由市场原理和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

贝蒂娜·比恩·格里夫斯

1995 年 2 月

前言

本书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根本立场，过去与现在，他正是因为这种立场而受到追随者的崇敬和对手的侮辱……虽然这六个讲座中的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成篇，但该系列讲座的和谐一致带来了一种审美上的愉悦，便如我们欣赏一座设计精良的大厦的建筑风格时所产生的那种审美愉悦。

——弗里茨·马赫卢普

普林斯顿 1979

1958年年底，阿尔贝托·贝内加斯-兰什博士邀请我丈夫访问阿根廷并举行一系列讲座，我也受邀陪同他。本书以书面形式记述了我丈夫对数百名阿根廷学生所进行的讲座内容。

我们抵达阿根廷时，贝隆已被迫去国数年。他破坏性的统治彻底摧毁了阿根廷的经济基础。他的继任者也好不了多少。这个国家准备要迎接新思想，而我的丈夫也同样准备要为他们提供这些思想。

他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大型演讲厅里用英语做的讲座。在隔壁的两个房间里，他的讲话被同时翻译成西班牙语，学生可用耳机收听。

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危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没有任何保留。来听我丈夫讲座的年轻人，对市场自由或个人自由都不太了解。我在《我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共度之岁月》（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中曾谈到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当时，有谁敢像我丈夫那样攻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警察就会立即冲进来抓住他，而集会也会被中断。”

观众的反应就好像是一扇窗户被打开了，新鲜空气涌入，吹过房间。他做讲座时没有任何讲稿，和往常一样，他只是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几个字，作为提示。他完全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并且，他以较为简单的语言，成功地向不熟悉他著作的听众们传达了他的思想，使他们能够准确地理解他的讲话。

讲座被录了音，而这些录音带后来被一位说西班牙语的秘书记录下来，我丈夫过世后，我在他遗留的文件中发现了打印出来的这些手稿。在阅读这些文字记录时，那些阿根廷人对我丈夫的讲话所回报的非同寻常的热情仍历历在目。而对于不是经济学家的我而言，这些传达给南美的经济学外行听众的讲座，比米塞斯许多理论著作更通俗易懂。我认为其中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包含了许多对于当下和未来都很重要的思想，因此，应当让公众都能看到。

由于我丈夫从未为出版而修订过他的讲座记录，这个任务就留给了我。

我非常小心地保留每句话的原意，不去改变其内容，并且保留了我丈夫经常使用的表达，他的读者对这些表达非常熟悉。我唯一的贡献是把句子合在一起，并且去掉了一些非正式谈话时所用的口语。如果我将这些讲座记录转化为一本书的努力算是成功了，那么仅仅是因为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我丈夫的声音，我听到他在说话。对我而言，他还活着，生机勃勃，他还在如此清晰地阐释政府权力过大的罪恶与危险，他还在如此全面且清楚地描述专制主义与干预主义之间的区别，他谈到了重要历史人物的才智，而只要很少几句话，他就能让过去的年代重现眼前。

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的好朋友乔治·克特尔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他的编辑经验，他对我丈夫理论的理解，对本书都大有裨益。

我希望这些讲座的读者不仅是学者，我丈夫有许多非经济学家的崇拜者，我也希望他们来读一读。而且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给年轻的读者，尤其是世界各地的高中生和大学生。

玛吉特·冯·米塞斯

纽约

1979 年 6 月

第一讲：资本主义

人们使用的形容词常具有误导性。例如，谈到现代的产业领袖和大企业领导者时，他们称之为“巧克力大王”或“棉花大王”或“汽车大王”。使用这样的术语，暗示人们实际上认为现代的产业领袖们与从前那些封建国王、公爵或领主没什么不同。但其实这两种人之间有天壤之别，因为“巧克力大王”根本没有统治权，他只是提供服务。他没有独立于市场、独立于他的顾客来统治被征服的领土。“巧克力大王”——或“钢铁大王”、或“汽车大王”、或其他任何现代的产业领袖——都必须依赖于他所经营的产业和他所服务的客户。这个“国王”的王位全赖“臣民”也即顾客的恩泽。一旦他不能以比竞争对手更价廉物美的方式向顾客提供服务，他立即就会失去他的王国。

两百年前，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一出生便已固定，直至终生；他从祖先那里继承身份，永不改变。如果他生来贫穷，那他将永远贫穷，而如果他生而富有——生来是领主或公爵——那么他将终生保有爵位，以及随爵位而来的财产。

至于制造业，那时原始的加工业几乎专门为富人的利益而存在。大多数人（90%或更多的欧洲人）在土地上劳作，与城市主导的加工业尚

无任何联系。数百年间，这种封建社会的僵硬体制在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

然而，由于农村人口增长，土地消化不了剩余人口。这些没有继承到土地或房产的过剩人口无事可干，也不可能在加工业中找到工作。城市统治者不许他们进入。这些“弃儿”的数量持续增长，而没人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是失地者，政府只能将他们安置在济贫院或救济所。在欧洲的部分地方，特别是荷兰和英格兰，到了18世纪，这种人的数量变得如此庞大，以至成了维持占优势地位的社会身份制度之真正威胁。

今天，在谈论某些情况类似的地区，如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时，我们不该忘记，18世纪的英格兰的条件更差。当时，英国有六七百万的人口，但在这六七百万人中，有超过一百万，很可能有两百万，都只是可怜的失地者，现有的社会制度不能让他们生存。如何安置这些失地者，成了十八世纪英格兰最大的问题之一。

另一大问题是缺乏原料。英国人不得不非常严肃地自问这一问题：若没有足够的森林提供生产和供暖所需木材，未来该怎么办？这对统治阶级是绝望的境况。政治家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执政官绅也束手无策。

现代资本主义正是产生于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之下。失地者和穷人中

的一些人，试着将其他人组织起来，建立起生产商品的小作坊。这是一个创举。这些开拓者们不生产只用于上流社会的昂贵奢侈品；他们生产满足大众需求的廉价产品。这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也是今日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这是大规模生产的开端，大规模生产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原则。相比之下，那些为城里的富人服务的传统加工业，几乎专门为上流社会的需求而存在，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则开始生产普通人民买得起的产品。正是以大规模生产来满足大众的需求。

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现今它存在于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的所有国家中。大企业是所谓的左派狂热攻击的目标，却几乎专门为满足大众需求而生产。仅为富裕阶层生产奢侈品的企业，永远不可能形成大型规模。而今天大工厂的工人，正是这些大工厂的产品的消费者。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原则和早先封建制度原则之间的本质区别。

如果人们认为，或宣称，大企业的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属于不同阶层，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的百货商场，你会听到这种口号：

“顾客永远正确”。而这里所指的顾客，正是在工厂里生产这些商品以供百货公司销售的人。认为大企业的力量穷凶极恶的那些人同样犯了错，因为大企业完全依赖于顾客的惠顾；如果失去了客户，哪怕最大的企业也会失去力量 and 影响。

五六十年前，人们认为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公司都过于强大，带有垄断性，不可能与之竞争。人们断言，在交通领域，资本主义已达到了自我毁灭的阶段，因为它消灭了竞争。人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铁路公司的力量取决于它能提供比其他任何运输方式都更好的服务。当然，既然旧有的轨线足以满足需求，那么修建另一条与已有铁路平行的铁路，来和某个大铁路公司竞争就很可笑。但很快出现了其他竞争对手。自由竞争并不意味着，你能通过模仿或完全复制别人已做过的事而轻易获得成功。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有权抄袭别人以获得成功，那是别人因其成就理所应得的成功。新闻自由意味着你有写些不同东西的权利。至于铁路的自由竞争，则意味着，比如，你可以自由地发明某种东西，做某些事，以此挑战铁路的地位，将其置于朝不保夕的竞争态势之中。

在美国，大巴，汽车，卡车和飞机都与铁路竞争，导致铁路运输至少在客运方面，遭受了近乎致命的打击。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坚持每个人都有权为顾客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服务。而这种方法，这种原则，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它让世界人口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土地资源只能满足 600 万人标准极低的生活。然而今天英国有超过 5000 万人享受着甚至比 18 世纪的富人都高得多的

生活水准。而英国人的大量精力如果不曾浪费在（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可避免的）政治与军事的“冒险行动”上的话，今天英格兰的生活水平很可能还会更高，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因此，如果一个英国人——或者，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现在对他的朋友说，他反对资本主义。那么，会有一种精彩的反驳：“你知道，当前地球上的人口比前资本主义时代多了十倍，你也知道，今天所有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都高过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祖先。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无须资本主义也能活下来的那 1/10 中的人呢？你活在现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已获成功的证据，不管你对自己的生活如何评价。

无视其所有好处，资本主义遭到了疯狂的攻击和批评。有必要理解这种反感的根源。事实上，仇恨资本主义的根源不在大众，不在工人自身当中，而在于英国和欧洲大陆拥有土地的上流社会——士绅阶层和世袭贵族。他们指责资本主义，是因为有件事让他们不快：在 19 世纪初，工业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迫使地主也得向农业工人支付同样的高工资。贵族借批评工人大众的生活水准来攻击工业。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看，工人当年的生活水平极端恶劣；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之差，绝对令人震惊，但这并非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损害了工人。工人受雇之前就已过着非人的生活。

重复了千百次的那个著名老故事，工厂雇用妇女和儿童，而这些妇女和儿童到工厂上班之前，本有着惬意的生活，这是史上最大的谎言之一。到工厂上班的母亲们已没米下锅。她们并不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厨房到工厂去。她们去工厂是因为她们没有厨房，即使有厨房，也揭不开锅。而这些孩子不是来自舒适的托儿所。他们饿以待毙。所谓早期资本主义无法形容的恐怖的一切言论，仅由一个统计数据即可驳倒：恰好是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些年头，恰好是被称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这一时期，从 1760 年至 1830 年，正是这些年间，英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千千万万的孩子——若在从前会夭折的孩子——死里逃生，并长大成人。

毫无疑问，以前的生活条件糟糕透顶，正是资本主义商业改善了这种状况。无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以出口产品再进口食品及原料的间接方式，的确正是这些早期的工厂提供了工人生活的必需品。一次又一次，早期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歪曲了历史（没有比这更温和的词能形容了）。

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则轶事很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讲道，富兰克林参观一家英格兰的棉纺厂，工厂老板充满自豪地告诉他：“你看，这是为匈牙利生产的棉织品。”本杰明·富兰克林环顾四周，看到衣衫褴褛的工人，问：“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工人生产呢？”

但是工厂老板谈到的那些出口产品，其实的确意味着他是为自己的工人生产的，因为英国必须进口所有的原材料。无论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都没有棉花。英国粮食短缺，食品必须从波兰、俄罗斯、匈牙利进口。这些出口是在为进口英国人民赖以生存的食品付款。当年历史上的许多例子都表现了绅士和贵族对工人的态度。我只想举两个例子。一是著名的英国“济贫”制度。通过这个制度，英国政府向所有没有获得最低工资（由政府决定该标准）的工人支付其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这解决了土地贵族支付高工资的困难。贵族们可以维持农业传统的低工资，而政府将提供补充，从而防止工人离开农村的工作，寻求在城市的工厂就业。

八十年后，资本主义从英国扩张到欧洲大陆之后，地主贵族再次反抗新的生产制度。在德国，普鲁士容克（容克指地主——译者注），因为资本主义的高薪产业而失去了许多工人，他们就此发明了一个特殊的术语：“从农村飞走”——即农村人口减少（Landflucht）。他们在德国议会里讨论，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反击这种罪恶，从地主角度而言的罪恶。

著名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在一次演讲时说：“我在柏林遇见一个曾在我土地上工作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离开土地？你为什么离开家乡？为什么你现在住在柏林？’据俾斯麦说，这人回答，“你在村子

里没有啤酒园，像我们在柏林那样漂亮的啤酒园。可以坐在啤酒园里喝啤酒，听音乐。”当然，俾斯麦是从他的（即雇主）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的。不完全是他工人们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进工厂，是因为工厂支付更高的工资，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标准。

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基本生活差异并不大；都不愁吃穿，居有定所。但在十八世纪或更早，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区别是，中产阶级的人穿鞋子，而下层人民打赤脚。今天的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往往只意味着凯迪拉克和雪佛兰之间的差异。雪佛兰可能是买的二手货，但对它的所有者而言，功能基本相同：他也可以开车从一地到另一地。在美国超过 50% 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公寓。

对资本主义的攻击——特别是关于更高的工资率——始于错误的假设，即工资最终不是由工厂里干活的那些人支付的。现在对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的学生而言，区分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分别标记，倒也罢了。但事实上，每个消费者必须以某种方式赚得他花费的钱，而绝大多数消费者同样正是企业的员工，这些企业生产他们所消费的商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率不是由脱离于打工者之外的人来决定的；发薪者和打工者都是他们自己。不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支付某个电影明星的工资，而正是花钱入场看电影的人来支付。不是拳击比赛的主办方支付获胜选手的高额奖金，而正是花钱看比赛的人来支付。通过区别

雇主和雇员，可以得到一种经济学理论上的区别，但它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区别；在此，雇主和雇员最终都是同一个人。

许多国家的人都认为，须养活好几个孩子一大家子的人与只须养活自己的人得到相同的工资太不公平。但问题并不在于雇主是否应该因工人的家庭规模而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们必须在这种情形下提出这一问题：你，作为个人，是否愿意为某种东西，比如说一块面包，假如你得知生产这块面包的工人有六个孩子，你愿意付更多的钱吗？诚实的人当然都会说不，并表示，“原则上我会，但事实上只要价钱更便宜，我宁愿买一个孩子都没有的人做的面包。”事实是，如果买方没有付给雇主足够多的钱，让他能给工人发工资，雇主将无法继续经营。

将资本主义制度称为“资本主义”，并非是对之有好感的人，其命名者认为它是史上邪恶透顶的制度，是人间曾经降临过的最大恶魔。这个人是卡尔·马克思。然而，没有理由抛弃马克思的术语，因为它清楚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的根源。这些进步都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其基础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作为一条规律，人们不会消费掉他们生产出来的所有东西，他们积蓄——并用其中一部分投资。关于这一问题存在大量误解。在这一系列的讲座中，我将有机会处理人们关于资本积累、资本的用途和由之产生的广泛收益的最根本性的

误解。在我关于外国投资，和当前最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即通货膨胀的讲座中，我还会专门探讨资本主义。当然，你知道，通货膨胀不仅仅存在于这个国家（指阿根廷——译者注）。它是全世界的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常常未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对所有急于生产或挣钱的人而言，储蓄意味着收益。当某人已经累积了一定数量的金钱，比如 1000 美元，他不用于消费，而是将这些美元存入储蓄银行或投入保险公司，资金从而进入一名企业家，一名商人的手中，让他得以着手从事某个项目。而在没有这笔必要资本的昨天，这个项目不可能开动。

现在有了这笔额外的资本，商人会做什么？他必做的第一件事，这笔额外资本的首要用途，就是出去雇佣工人和购买原材料——相应地，产生了对工人和原材料的进一步需求，以及提高工资和提高原材料价格的趋势。远早于储蓄者或企业家从中获得任何利润之前，失业的工人、原材料生产者、农民、打工者都已在分享额外储蓄的收益。

什么时候企业家能从这一项目中获利，取决于市场的未来状态，以及他对市场未来状态的正确预测能力。但是工人们以及原材料的生产者却立即获得了收益。30 或 40 年前，关于所谓的亨利·福特的“工资政策”，人们谈过很多。福特先生的一个伟大成就是他支付的工资比其他实业家或工厂更高。他的工资政策被形容为一个“发明”，然而并不足以表示，这个新“发明”的政策源于福特先生的慷慨。某一新兴

产业，或现有产业中的新建工厂，必须从其他工作岗位，从国内其他地区，甚至从其他国家吸引工人。唯一的方法是为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资本主义早期情况如此，今天也仍是如此。

当英国的制造商首先开始生产棉制品时，他们付给工人超过以前所挣的工资。当然，大部分新工人之前都没有任何收入，提供任何条件都愿意接受。但短短一段时间之后——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新建的企业越来越多——工资率上升，结果如我前述，英国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

一些人充满鄙视地描述资本主义，以为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制度，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说法从头错到尾。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工人越来越穷、大众越来越困苦，到最后，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都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或集中在某个人手里。因此，广大贫困的工人最终会暴乱，剥夺富人的财富。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机会、没有任何可能性得以改善。

1864 年在英国，对国际工人协会演讲时，马克思说，相信工会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这“绝对错误”。他将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率和缩短工时的政策称为保守——当然，“保守主义”是卡尔·马克思所能使用的最具谴责性的术语。他建议工会为自己设定一个革命性的新目标：“完

全废除工资制度”，以“社会主义”——生产手段的政府所有制——来代替私人所有制。

如果我们回顾世界历史，特别是自 1865 年以来的英国历史，我们会意识到，马克思各方面都错了。没有哪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民众的生活条件未曾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不管马克思如何预言，过去 80、90 年一切都在进步。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工人的条件绝不可能得到改善。他们遵循着一个谬论，著名的“工资铁律”——这个定律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不会超过维持他能为企业卖命所需的生活水平为限的数额。

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方式形成其理论：如果工人工资率上升，超过生存必需的水平，他们就会养更多的孩子；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了劳动力，工人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工资率降低，使工人工资再一次跌到只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这种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仅能使工人免于灭绝。但马克思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的这种理念，所使用的工人的概念，完全类似于生物学家研究动物时所使用的概念，比如老鼠，对研究动物而言，当然是正确的。

如果你增加动物或微生物的可得食物的数量，它们存活的数目将会增多。如果你限制它们的食物，那么你也会限制它们的数量。但人是不同的。即使是工人——尽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类有食物

和种族繁衍之外的欲望。提高实际工资结果不仅是人口增加；其结果更首先在于提高平均生活水准。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欧和美国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比如说非洲）。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资本的供给。这解释了美国和印度生活条件的差异；印度引进了对付传染病的现代方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其效果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但是，因为人口增长并没有伴随着资本投资数额的相应增长，结果是贫穷人口的增加。一个国家变得更加繁荣，与人均投资资本的增加相关。

我希望在我的其他讲座中，我将有机会更详尽地阐述并澄清这些问题，因为一些术语，比如“人均投资资本”需要更加详细的说明。

但是，你们必须记住，在经济政策中没有奇迹。你们已在很多报纸和演讲中看到，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德国在二战战败破坏之后的恢复。但这不是奇迹。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应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应用，即使没有完全应用于所有领域。每个国家都能经历同样的经济恢复“奇迹”，尽管我必须坚持经济恢复不是来自于什么奇迹，它是来自于适用合理的经济政策，是这种政策的结果。

第二讲：社会主义

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应经济自由传播中心（theCentro de Difusión Economía Libre）的邀请。那么，什么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制度是什么意思？答案很简单：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劳动社会分工中的个人通过市场实现合作的制度。这里的市场不是指的某个地点，而是一种过程，是个人通过买卖、通过生产和消费，为整个社会作出贡献的方式。

在谈论这种经济组织的制度即市场经济时，我们使用了“经济自由”这一术语。很多时候，人们误解了经济自由的含义，认为经济自由与其他各种自由不相干，认为其他自由更加重要，而且即使没有经济自由，那些自由也能够保存。

经济自由的含义是：个人能够选择他融入社会整体的方式。个人能够选择职业，选择做他想做的事。当然，今天许多人赋予“经济自由”一词的含义已与此绝不相同。他们的意思是，通过经济自由，人类可以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但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什么能被称之为自由，只有自然法则的规律，人类如果想有所收获，必须服从这种规律。

将“自由”这一术语运用于人类时，我们考虑的只是社会中的自由。然而，今天许多人认为社会中的各种自由互不相干。现今自称为“自由主义者”（liberals）的人所要求的政策与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其计划中所倡导的政策恰恰相反。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非常普遍地认为，即使没有所谓的经济自由，也能维护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未经审判不受监禁之自由等所有这些自由。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市场制度，如果政府指挥一切，其他所有的这些自由都是幻影，即使将之写进了宪法，制定了法律。

以其中的一种自由，出版自由为例。如果政府拥有所有的印刷机，它就能决定印什么不印什么。而如果政府拥有所有的印刷机，并决定印或不印什么，那么，实际上就已不存在印刷与政府观念相反的任何争论的可能性了。出版自由便消失了。其他所有的自由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有选择他愿意从事的任何职业的自由，有选择以他自己的方式融入社会的自由。但社会主义制度下并非如此；他的职业由政府指令而定。政府可以命令其不喜欢的人，它不愿意其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迁徙到别的地区，别的地方。而政府总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解释这种过程，宣称政府计划需要这位杰出的公民离开当权者不喜欢他的地方，出现在五千英里以外。

的确，从纯理论的角度看，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获得的自由并不是完

美的自由。但根本没有完美的自由这种事。自由只意味着处于社会框架内的东西。18 世纪的“自然法”作者——尤其是卢梭——认为在遥远的过去，人类曾经享有所谓“天然”的自由。但是，在遥远的过去，个人并不自由，他们受比其更强壮之人的支配。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可能听起来有些道理，但其实人并非生而自由。人生下来时，是非常弱小的婴儿。没有其父母的保护，没有社会给予其父母的保护，他将无法存活。

社会中的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依赖于旁人，旁人也同样依赖于他。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经济自由下的社会，处于这样的状态，即每个人都为他的同胞服务，并得到他们的服务作为回报。人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老板们可独立于他人的善意和支持，认为业界领袖、商人、企业家是这种经济制度中真正的老板。但这是一种错觉。这种经济制度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如果消费者不再惠顾某一商业部门，这些商人要么被迫放弃其在经济制度中的显赫地位，要么得依照消费者的愿望和命令来调整其行为。

最著名的共产主义宣传者之一是巴斯菲尔德夫人（Lady Passfield），她的闺名为比阿特丽斯·波特（Beatrice Potter），后来也因她的丈夫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而出名。这位夫人是富商之女，她年轻时曾担任她父亲的秘书。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父亲的企业里，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我父亲即老板发出的指令。只有他发号施令，没有任何

人对他发号施令。”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看法。向她父亲下令的是消费者，是买主。不幸的是，她看不到这些命令；她看不到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事，因为她感兴趣的只是从她父亲办公室或工厂发出的命令。

对于所有的经济问题，我们都必须牢记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的话，他有一篇名为“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的精彩文章。要理解经济制度的运作，我们须处理的不仅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还必须关注那些不能被直接感知的东西。例如，老板对办公室职员下令，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听不见的则是顾客对老板的命令。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终的老板是消费者。主权者不是国家，而是人民。证明人民是主权者的证据就是他们有权愚蠢。这就是主权者的特权。他有犯错的权利，没人能阻止他犯错，当然，他也得为错误付出代价。我们说消费者至高无上，或者消费者是主权者，并不是说消费者不会犯错，不是说消费者始终知道什么对他是最好的。消费者经常会有不当购买或不当消费。

但是，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能够控制人们的消费从而避免他们损害自己，那么这种观念就错。这种父权制政府的观念，这种政府是每个人的监护人的观念，正是热衷社会主义之人的观念。在美国，多年前，政府尝试了所谓的“高尚实验”（a noble experiment）。这一

高尚实验是一部认定买卖酒精饮料为非法的法律。当然，的确有许多人滥饮白兰地和威士忌，由此可能伤害他们自己。美国有些当权者甚至反对抽烟。当然，有许多人抽烟过度，许多人不顾及不抽烟对他们更好的事实而坚持抽烟。这就提出了一个远超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这揭示了自由真正的含义。

姑且认为，防止人们因饮酒或抽烟过度而损害自己是件好事。但是，一旦你认可了这点，其他的人就会说：身体就是一切吗？人的精神难道不是更重要得多吗？精神难道不是真正的人类禀赋，真正的人类特质吗？如果你给予政府权利来决定事关人类身体的消费，决定人们是否应该抽烟喝酒，那么若有人说：“比身体更重要的是精神和灵魂，读坏书、听坏音乐以及看坏电影，对人们自身的危害更大得多。因此，政府有责任阻止人们犯下这些错误”，你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而且，如你所知，许多世纪以来，政府和当权者相信这的确是他们的职责。这不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就在不久以前，德国政府还认为，辨别绘画的优劣是一项政府职责。当然，其优劣是年轻时曾落榜维也纳艺术学院入学考试的某人所认为的优劣；是明信片画家阿道夫·希特勒所认为的优劣；而就绘画和艺术发表与最高元首不同的观点即为非法。

一旦你开始认可控制酒精消费是政府职责，你该如何回答那些提出控

制书籍和思想更为重要的人？

自由实际上意味着犯错误的自由。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点。我们可能对他人花钱或生活的方式极为反感，我们可能认为他们所为极其愚蠢和糟糕，但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就他人应该如何改变生活方式，人们有很多方式来宣扬其观点。他们可以写书，写文章，发表演讲，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在街头宣讲——许多国家都有人这样做。但一定不能为了阻止他人做某些事而监管他们，仅仅因为这些人自己不希望他人有行事的自由。

这就是奴役和自由的区别。奴隶必须照上级的命令去做，但是自由公民（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会被某些人滥用，而且正在被某些人滥用。当然，有可能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是如果多数人赞同这些事，那么不赞同的人总有办法试着去改变他同胞的想法。他可以试着劝导他们，说服他们，但他不可试图使用暴力、使用政府的警力来强迫他们。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服务于他人。18 世纪时自由主义作家们在谈到“所有群体和所有个人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之协调”时，他们想到的便是如此。而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正是这种利益协调的学说。他们谈论的是不同群体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是什么意思？卡尔·马克思在那本拉开其社会主义运动序幕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中宣称，阶级之间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他找不到任何非前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的例子来阐明其观点。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被划分为世袭的身份群体，这在印度被称为“种姓”（castes）。在一个身份社会中，比如说，一个人不是生而成为法国人，而是生而成为法国贵族或法国中产阶级或法国农民。在中世纪，他更可能只是成为一名农奴。而直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法国的农奴制才完全消失。在欧洲其它地方，农奴制消失得甚至更晚。

但是，最恶劣的农奴制存在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而且甚至在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后还继续存在。个人继承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并终生保持不变，再将其传给后代。每个群体都有其特权和劣势。地位最高的群体只有特权，地位最低的群体只有劣势。并且，除了与其他阶级进行政治斗争之外，人们别无它途摆脱因其社会地位而被加诸的法律上的劣势。在此状况下，你可以说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因为奴隶希望摆脱奴隶身份，摆脱成为奴隶之命运，然而，这对奴隶主而言意味着损失。因此，毫无疑问，在不同阶级的成员之间必然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人们一定不要忘记，在那些年代，身份社会主导了欧洲，以及后来欧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与本国其他阶级有任何

特殊的联系；他们认为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阶级的成员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一位法国贵族不会把下层法国人当作同胞，下层法国人是不喜欢的“低等人”。他认为其他国家的贵族，如意大利、英国和德国的贵族，才是其同类。

这种状况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全欧洲的贵族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这就是法语，而在法国之外，除了贵族，其他群体都不懂法语。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有自己的语言，下层即农民则用方言，其他阶层往往听不懂方言。着装也是如此。如果你在 1750 年周游列国，你会发现上等阶级即贵族的着装在全欧洲通常都是一样，下等阶级则与之不同。你在街上遇见某人，你立即就能从他的衣着看出他所属的阶级，所属的社会地位。

难以想象与那种状况相比，今天有了多么大的不同！我从美国来到阿根廷，在阿根廷的街头看见某人，我无法得知其社会地位。我只能假定他是一位阿根廷公民，并且没被法律限制自由。这是资本主义的成果之一。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差异。存在财富上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认为，这种财富上的差异等同于身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古老差异。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差异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差异。在中世纪时期（在许多国家延续到更晚近的时期），某个家族可能是贵族并拥有大

量财富，一个公爵家族可以持续好几百年，无论其素质、才能、品行或道德如何。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这是社会学家学术性的称谓。照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说法，这种社会流动性的运作原理是“精英循环”（the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s）。这意味着，总有人处于社会阶层的顶端，总有富人，总有人具有政治地位，但这些人——这些精英——不断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完全正确，前资本主义的身份社会中却非如此。那些曾经是欧洲大贵族的家族，现在还是同样的家族，或者说，是那些 800 或 1000 年前，或更早以前欧洲最尊贵的家族的后裔。曾长期统治阿根廷的波旁的卡佩皇族（The Capetians of Bourbon）早在 10 世纪就成为了皇室。该皇室的国王们统治着现在称之为巴黎大区（Ile-de-France）的疆域，王权代代相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持续的流动性——穷人变富，而富人的后代丧失财富，变得贫穷。

今天，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中心街道的书店里看到了一名商人的传记。在 19 世纪的欧洲，这名商人生意做得很大，他是那么杰出、那么重要、那么独特，因此即使在远离欧洲的阿根廷，书店里也售有他的传记。我刚好认识他的孙子，与其祖父同名，而且他仍然有权冠以他祖父的贵族头衔。他铁匠出身的祖父在 80 年前被授予了贵族头衔。现在，这位孙子是纽约的一名贫穷的摄影师。

而在这位摄影师的祖父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巨子之一的时候曾是穷人的那些人，如今却成了产业领袖。每个人都有改变自身地位的自由。这就是身份制度与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某人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地位，他只能怪他自己。

迄今为止，20 世纪最著名的工业家是亨利·福特。他从朋友那里借了几百美元起家，没过多久，他就发展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大企业之一。而每天都可发现数百例类似的故事。

每天，纽约时报都刊出长长的讣告名单。如果你阅读逝者生平，你可能会在无意中发现某个杰出商人的名字。他起初或是纽约街头的报童，或是办公室职员，而当他逝世时，他或许已成了他从最底层起步的那家银行的总裁。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地位，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获得这种地位。有人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而对这些人来说，现在也有其它的路可走，而在封建社会的时代，在身份社会的时代，却没有这种途径。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禁止择业这种基本自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唯一的经济权威，它有权决定与生产相关的一切事宜。

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件事物有许多不同的名称。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一个同义词是“计划”。如果人们说“计划”，当然指的是中央计划，指的是政府做出的计划，这种计划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的计划。

一位英国女士，也是上议院的一员，曾写了一本书，名为《计划或无计划》（Plan or No Plan），这本书在全世界风行一时。她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当她说“计划”时，她指的仅仅是列宁和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们所设想的那种计划，那种控制一国之中所有人一切活动的计划。因此，这位女士意指的中央计划排除了所有个人的计划。所以，她这个“计划或无计划”的书名就是种误导，是种欺骗。不是在中央计划或无计划中二选一，而是在中央政府权威的总体计划或个人制定并执行自己的计划的自由中二选一。每天个人都在计划他的生活，并随时按自己的意愿改变计划。

自由的人每天按需计划；比如，他说：“昨天我计划一辈子都在科尔多巴工作。”现在他得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条件更好就改变了计划，说“我想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是待在科尔多巴。”这就是自由的含义。他可能搞错了，到头来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可能是个错误，对他来说科尔多巴的条件可能更好，但这是他自己作出的计划。

在政府计划之下，他如同军队里的士兵。军队里的士兵无权选择所属军营，选择服役地点。他必须服从命令。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将军事

管理运用于整个生产系统，卡尔·马克思、列宁和所有社会主义领袖都知道并承认这一点。马克思谈到“产业大军”，而列宁要求“以军队为模式来组织一切，组织邮局、工厂和其他的产业。”

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仰仗于最高当局的那些人的智慧、才能和天赋。最高独裁者——或他的委员会——不知道的事就不会纳入考虑。但是人类在其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知识不会被每个人所掌握；千百年来，我们积累了天量的科技知识，某一个人要知道所有这些知识实非人力所能及，哪怕他是最聪明的人。

而人与人各有不同，人们不一样。始终都是如此。有些人在某一领域更有天赋，而在别的领域则不行。有些人有发现新路径，改变知识趋势的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正是通过这些人取得了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如果某人有了个想法，他可以尝试找到少数几个人，这几个人足够聪明，能认识到其想法的价值。某些资本家会将之付诸实践，他们敢于寄望于未来，能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可能产生的效果。其他人一开始可能会说“这些傻瓜”，但当他们发现他们曾认为很愚蠢的这个企业兴旺发达了，人们高高兴兴地去买它的产品，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了。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制度下，要想追求和发展某种想法，必须先要说服最高当局接受该想法的价值。这可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只有首脑机关的那些人，或者最高独裁者本人，才有决定权。而如果这些人因为懒惰或年迈，或因为他们脑子不太灵光，没有学识，不能理解新想法的重要性，那么这种新项目就无法实施。

我们可以看看军事史上的例子。拿破仑当然是军事天才，然而，他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无力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因此兵败如山倒，被流放到荒凉的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的问题是：怎样征服英国？为此，他需要一支跨越英吉利海峡作战的海军。当时曾有人告诉他，他们有能力成功渡海，在帆船时代，这些人想出了蒸汽船的新主意。但是拿破仑不能理解他们的提议。

然后是著名的德军总参谋部（Generalstab）。一战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其军事智慧无人能及。法国将军福煦的参谋部也同样享有盛名。但是不管是德国人，还是后来在福煦将军指挥下打败了德国人的法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航空技术对实现军事目的的重要性。德军总参谋部说：

“航空只是用来娱乐的，飞行是闲人的享受。从军事角度看，只有飞艇是重要的。”法国总参谋部也持同样的观点。

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位将军被人说服，认定在下一次战争中航空至关重要。但美国其他所有的专家们都反对他。他无法说服他们。如果你必须说服一群人，而这群人与该问题的解决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你永远成功不了。非经济问题同样也是如此。

曾有画家、诗人、作曲家抱怨公众认识不到他们创作的价值，令他们陷于贫困。公众确实可能鉴别力低下，但是当这些艺术家们说：“政府应该支持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和作家”时，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政府会委托谁来判断某个新人是不是一名伟大的画家？它不得不依赖批评家们和艺术史教授们的判断，而艺术史教授们总是沉湎于过去，罕有发现新天才的能力。这就是“计划”的制度和每个人都能为自己计划和行动的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

当然，伟大的画家和伟大的作家常常不得不忍受非常的艰苦。他们或许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却赚不到钱。梵高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苦难，最终，他在三十七岁那年自杀了。他一生只卖出了一幅画，而买家是他的堂兄。除了卖出这唯一的一幅画外，他一直靠他哥哥的钱维生，他哥哥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画家，但能理解一位画家的需求。而现在，要是没有一二十万美元的话，你根本买不到梵高的一幅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梵高的命运或许不同。某位政府官员会询问一些有名的画家（当然在梵高眼里这些人根本算不上艺术家），这个疯疯癫癫的年轻人是不是个真正值得支持的画家？而毫无疑问，这些人会回答：“不，他不是个画家，不是个艺术家，他只是在浪费颜料。”然后，他们会把梵高送入牛奶厂或精神病院。因此，新兴一代的画家、

诗人、音乐家、记者和演员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全都是基于一种错觉。我要指出这点，是因为这些群体是社会主义思想最狂热的支持者。

当谈到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时，问题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的作家们从不怀疑现代工业和所有现代企业的运作是基于计算。当然绝不仅仅是工程师要在计算的基础上制定计划，商人也必须如此。商人的计算完全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货币价格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信息，也为商人提供关于生产要素极为重要的信息，市场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决定生产过程中最后阶段的成本，以及将货物转移给消费者的成本，而同样要决定之前的生产步骤的成本。整个市场制度与不同商人之间的经过理智计算的劳动分工相联系，这些商人为生产要素而竞争——原材料、机器设备，也为生产的人力要素，为劳动支付的工资竞争。如果没有市场提供的价格，商人的这种计算就无法完成。

社会主义者希望废除市场，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计算都再无用处。技术专家们可以给你提出一大堆项目，从自然科学角度看都同样可行，但是这需要市场——基于商人的计算来弄清楚从经济角度看，其中哪个项目才是最有利的。

我在此阐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计算的基本事项与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经济计算，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有技术性计划，都只有在存在货

币价格时才有可能，不仅要有消费品的价格，而且要有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意味着必须得有原材料的市场、所有半成品的市场、所有工具和机械的市场，以及各种人力劳动和人力服务的市场。

这一事实被发现时，社会主义者不知该如何应对。长达 150 年间，他们都是说：“市场和市场价格是这个世界的万恶之源。我们要废除市场，当然，还有与之相伴的市场经济，并代之以一种没有价格和市场的制度。”他们想要废除马克思所称的商品和劳动的“商品属性”（commodity character）。

面对这一新问题，社会主义作家们无法作答，最后说：“我们不会完全废除市场。我们会假装还存在市场，就象孩子们玩上学的游戏那样，我们也可以玩市场的游戏。”但是众所周知，当孩子们玩上学的游戏时，他们什么都学不到。这只是一次练习，一场游戏，而你只能是假装很多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详尽地阐述需要更多的时间。我的书中我有详细的解释。在六次演讲中我无法深入分析其方方面面。因此，如果你对社会主义下计算和计划之不可能性的基本问题感兴趣的话，我想建议阅读拙作《人的行动》，该书有出色的西班牙语译本。

还可阅读其他人的书，比如挪威经济学家特吕格弗·霍夫（Trygve Hoff）

关于经济计算的著作。而如果你不想只听一面之词，我推荐你阅读关于这一主题深受好评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作者是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他曾经是美国大学的教授，然后当了波兰的大使，后来又返回了波兰。

你很可能会问我：“俄国怎么样？俄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这就改变了问题。俄国实施其社会主义制度，是处于一个有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各种东西价格的世界之中。因此，他们能够为其计划而利用世界市场的外部价格。然而，由于俄国和美国的条件有所不同，结果往往是，某些事情从俄国人的经济立场看是可行的明智的，而美国人则认为在经济上完全不可行。

所谓“苏联实验”，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它不能告诉我们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即计算问题相关的任何事。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实验么？我确实不相信在人类行为和经济学的领域存在科学实验这种事。你无法在人类行为的领域进行实验室实验，因为科学实验要求你在不同的条件下做同样的事，或者你保持同样的条件，可能只改变一个因素。例如，如果你给某个患了癌症的动物注射某种药物，结果可能是癌症消失了。你可以在患了同一种癌症的同种动物身上检测。如果你用新药治愈了一些动物而未能治愈其他的动物，那么你可以比较结果。你不能在人类行为的领域这样做，人类行为不存在实验室试验。

所谓的苏联“试验”只是表明了，苏维埃俄国的生活水平比起全世界公认的资本主义典范美国的生活水平低到不知哪里去了。

当然，如果你对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他会说：“俄国的情况好极了！”你告诉他：“或许是好极了，但平均生活水平要低得多。”而他会回答：“是的，但请记住，俄国人在沙皇的统治下有多么悲惨，并且我们还曾经历多么残酷的战争。”

我不想讨论这种解释是否正确，但是如果你否认了条件是相同的，你也就否认了这是一次实验。那么你必须说（这可能正确得多）：“在俄国，社会主义未能给普通人的状况带来能与同时期内美国相比的改善。”

在美国，几乎每周你都会听到一些新东西，一些新进步。这是商业创造的进步，因为成千上万的生意人日以继夜地寻找新产品，这些新产品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生产成本较低，或比起现存产品而言更加价廉物美。他们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来做这些事，做这些事为了赚钱。其结果是比起五十或一百年前的状况，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是不可思议。但是在苏维埃俄国，没有这种制度，就没有类似的提高。所以，那些告诉我们应该采用苏联制度的人错得离谱。

还有些事应被提及。美国的消费者，每个人，既是买主也是老板。当

你离开一家美国商店时，你可能会发现一条标语写着“感谢惠顾，欢迎下次光临”。但当你走进一家集权国家的商店时，比如现在的俄国或者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店员会告诉你：“你必须感谢伟大领袖赐予你这些东西。”

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心存感激的不是卖家而是买主。公民不是老板，老板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办公室。这些社会主义的委员会、领袖和独裁者是至高无上的，而人民只能服从。

第三讲：干预主义

一句非常有名俗语常被人引用：“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认为，这样描述一个好政府的职能并不准确。政府应该遵从建立它的目的，做一切需要它做的事。政府应该保护本国居民免受歹徒的暴力和欺诈之侵犯，并且应该保卫国家、抵御外敌。这些都是自由体制和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

当然，Under socialism, the government is totalitarian, 无所不管，无远弗届。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市场经济平稳运行，不受国内外欺诈和暴力的侵犯。

不同意政府职能这一定义的人会说：“此人憎恨政府”。没有比这更脱离事实的说法了。如果我说汽油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液体，有多种用途，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喝汽油，因为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么我并非与汽油为敌，也绝不憎恨汽油。我只是说，汽油对某些特定的目的非常有用，但不适合其他用途。如果我说，政府的职责是抓捕杀人犯或其他犯罪分子，但运行铁路或者为无用的事情开支并非政府的职责，那么，我宣称政府适合做某些事情而不适合做其他的事，这不能说明我讨厌政府。

据说，在今天的情形下，我们再没有任何自由经济体系，只有被称作“混合经济”的东西。而人们指出，作为混合经济的证据是众多企业由政府经营或拥有。人们说，经济是混合的，因为在许多国家，某些特定机构比如说电话、电报及铁路都是由政府所有并经营的。

某些机构和企业确实由政府经营。但是，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改变我们经济体制的特征。这甚至不意味着在 nonsocialist 即自由市场经济中有了一个“little socialism”。政府经营这些企业时必须市场至上，也就是必须消费者至上。比如说，政府经营邮政或铁路，必须要雇些人在这些企业里干活。同样，也必须购买企业运营所需的原材料和其他东西。而另一方面，它向公众“出售”服务或商品。确实，即使它以自由经济制度的方式来营运这些机构，结果都必然是赤字。然而，政府能够出资弥补这种赤字——至少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 the ruling party 都这样认为。

要是个人当然不行。个人很难运营出现赤字的企业。如果不能很快消除赤字，并且实现盈利（或者至少表明不会发生进一步的赤字），那么他就会面临破产，企业必将倒闭。

但对于政府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政府可以在赤字下运行，因为它有权力向人们征税。并且如果纳税人准备支付更高的税收，使政府能够

运营一家亏损企业——也就是说，能以比私人机构效率更低的方式运营——人们如果愿意接受这种损失，这家企业当然会继续下去。

近年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增加了国有化机构和企业的数量，以至于赤字的增长远远超出了可征收到的税款。之后发生了什么不是今天的主题。这就是通货膨胀，我明天再说。我提到这一点，只不过是因为绝不能把混合经济混同于干预主义，我今晚要谈的正是干预主义。

什么是干预主义？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并不将其行为限于维持秩序，或正如人们一百年前所说的，限于“提供安全”。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想做更多的事。它要干预市场现象。

如果有人反对，说政府不应干预商业活动，那么人们经常的回答是：

“但是政府总有必要干预。如果街上有警察，就是政府干预。它干预强盗抢劫商店，或者阻止盗窃车辆。”但是讨论干预主义，定义什么是干预主义时，我们说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和警方应当保护公民，包括商人，当然还有他们的员工，免受国内外歹徒的攻击，这其实是对任何一个政府正常且必要的期望。这种保护不是干预，因为这是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确切地说，就是提供安全。）

当我们谈论到干预主义时，我们心中所想的是政府渴望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防止暴力和欺诈。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不仅不能保护市场经

济的顺利运行，而且它干预各种市场现象，干预价格、工资率、利率以及利润。

政府干预是为了迫使商人以不同的方式经营，不同于他们只服从于消费者时会选择的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的所有措施都直接限制了消费者至上。在自由经济中，消费者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政府想要篡夺这种权力，或者一部分这种权力。

举个干预主义的例子，这在许多国家很受欢迎，许多政府试了一次又一次，特别是通货膨胀时期。这个例子就是价格管制。

如果政府印了太多钞票，人们开始抱怨其导致的物价上涨时，各国政府常常会诉诸于价格管制。历史上有很多价格管制失败的著名例子，但我谈其中的两个，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的确非常积极地强制实施或试图强制实施价格管制。

第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他作为最后一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而闻名于世。在 3 世纪下半叶，这位罗马皇帝只剩了一个财政手段就是使通货贬值。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原始时期，可以说甚至通货膨胀也是原始的。它涉及铸币贬值，尤其是银币。政府将越来越多的铜混进银币里，甚至连银币的颜色都变了，重量也相应地大大降低。铸币贬值和货币数量的相应增加，结果是价格

上涨，紧接着便是价格管制。并且罗马的皇帝都会严厉地强制执行，他们并不认为对涨价者施以死刑是什么了不得的惩罚。他们强制进行价格管制，却未能控制社会，其结果是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劳动力分工体系的瓦解。

然而，1500年之后，同样的通货贬值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但是这次手法不同。造币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法国不再需要求助于铸币贬值。他们有了印钞机。印钞机效率很高。结果又一次是前所未有的物价暴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再使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那样的死刑方式来强制执行最高限价。他们处死市民的手段也有了进步。大家都记得著名的约瑟夫·吉约丹博士（J. I. Guillotin 1738-1814），他主张使用断头台。即使有了断头台，法国也未能维持最高限价。当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自己被押到断头台上时，人们大喊：“去你的最高限价”。

我提起这些，是因为人们常常说：“只要更残酷、更积极，就能高效地管制价格。”现在看到，戴克里先当然非常残酷，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然而，这两个时代的价格管控措施都完全失败了。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政府听到人们抱怨，牛奶的价格上涨了。牛奶当然非常重要，对于下一代，对于儿童尤其重要。因此，政府宣布了牛奶的最高限价，比可能的市场价格更低的最高限价。现在

政府说：“当然，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该做的事，以便让贫穷的父母按其所需购买牛奶喂养小孩。”

但会发生什么呢？一方面，较低的牛奶价格增加了对牛奶的需求。在政府所定的较低价格下，以前在高价时买不起牛奶的人，现在买得起了。而另一方面，某些生产商，即那些成本最高的牛奶生产商，也就是边际生产者，遭受亏损，因为政府定的价格低于他们的成本。这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一点。而私人企业家，私人生产商，无法长期承担亏损。既然他们不能承担牛奶亏本，他们就会限制供给市场的牛奶产量。他们可能会把一些奶牛卖给屠宰场，或者卖一些用牛奶制成的其他产品，比如酸奶、黄油或奶酪。

因此，政府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导致了牛奶的供给减少，同时需求却增加。一些准备在政府定的低价下购买牛奶的人买不到牛奶了。另一种结果是人们急着去商店买牛奶，却不得不在门外排队等待。在政府制定了所谓重要商品最高限价的城市里，在商店外大排长龙的景象司空见惯。哪儿有牛奶限价，哪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学家对此总是有言在先，当然，只是靠谱的经济学家，他们为数不多。

但是，政府价格管制结果如何？政府失望了。它希望让喝牛奶的人满意。但事实上，它却令人不满。在政府干预牛奶之前，牛奶价格虽高，但人们买得到。而现在，牛奶仅有少量供给。因此，牛奶的总消费量

下降了。儿童喝到的牛奶更少而不是更多。接下来政府能采取的措施就是限量供给。但是，限量供给仅仅意味着特定的人拥有得到牛奶的特权，而其他人根本得不到牛奶。当然，谁能得到牛奶，总是政府随心所欲而定。比如，可能宣布某条命令，四岁以下的儿童可得到牛奶，而四岁以上的儿童，或四到六岁的儿童，只能得到四岁以下儿童所得牛奶的一半。

无论政府怎么做，事实就是牛奶的供给量减少了。因此，人们比以前更不满。现在政府责问牛奶生产商（因为政府自己想不出理由）：“为什么你们不生产跟以前一样多的牛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做不到，是因为生产成本比政府所定的牛奶最高价格还要高。”于是政府研究了各项生产成本，发现其中之一是饲料。

政府说：“噢，现在我们将会对饲料施以与牛奶相同的价格控制。我们将确定饲料的最高限价，这样你们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较少的支出饲养奶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将能够生产和销售更多的牛奶。”

但是，现在情况又如何呢？同样的故事在饲料上重演了，而如你能理解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饲料的生产下降，政府再次面临困境。因此，政府安排了新的听证会，以找出饲料生产的问题。从饲料生产者那里得到的解释和从牛奶生产商那里得到的非常相似。因此，政府必须更进一步，因为它不想放弃价格管制的原则。它为生产饲料所必

需的原料确定了最高限价。同样的故事再度上演。

同时，政府不仅要管制牛奶，还要管制蛋、肉及其他必需品。每次政府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到处都是一样的情形。一旦政府对消费品实行最高限价，它不得不进一步限制了生产者所需的商品的价格，以满足对限价的消费品的生产需要。所以，政府起初只控制几样价格，再一步步追溯到生产过程之中，限定各种生产性商品的最高价格，当然也包括劳动力价格，因为没有工资控制，政府的“成本控制”将毫无意义。

此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法限于那些被视为重要的必需品，如牛奶，黄油，鸡蛋和肉。还必须包括奢侈品，因为如果它不限制奢侈品的价格，资本和劳动力将放弃生产重要的必需品，而转向生产那些政府认为不必要的奢侈品。因此，对某一个或几个消费品孤立的价格干预带来的影响，必然使之甚至不如以前的状况，认识到这点很重要。

政府干预之前，牛奶和鸡蛋昂贵；政府干预之后，它们开始从市场上消失。政府认为所干预的东西非常重要，希望增加供给数量。结果恰恰相反：孤立干预所导致的状况——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甚至比之前政府想要改变的状态更不可取。随着政府越走越远，最终，所有的价格、工资率、利率，简而言之，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切都由政府决定。显然，这就是 socialism。

在此我向你们所作的简要的理论解释，正是那些试图强制实施最高限价的国家所发生的事，那些政府极为固执，一步步走向末路。这也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和英国。

让我们来分析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并且这两家政府都实施了价格管制。开始只有少数价格，只有牛奶和鸡蛋，却不得不越走越远。战争持续越长，通货膨胀越严重。开战三年后，德国人像以往那样系统性地制定了一项宏大的计划。他们称之为兴登堡计划（Hindenburg Plan）：那时德国政府所认为的好东西都会以兴登堡命名。

兴登堡计划意味着整个德国的经济体系都应由政府控制：包括价格、工资、利润——所有的东西。官僚机构立即开始执行。但他们尚未完成，灾难就已来临：德意志帝国崩溃了，整个官僚机构都消失了，这场革命带来的血腥结果——一切都告终结。

英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1917年春美国卷入战争，并供给英国足够的资源。因此打断了 the road to socialism, the road to serfdom。

希特勒上台之前，总理布吕宁（Brüning）再次以惯用的理由在德国引

入价格管制。希特勒强制实施这种价格管制，甚至早开战争之前。在纳粹德国，没有私有企业，也没有私人的激励。纳粹德国所实行的 socialism 与俄国 socialism 的区别，只限于仍保留了自由经济体系的术语和标签。尚存一些所谓的“私有企业”，但其所有者不再是企业家，而被称为“商店管理者”（Betriebsführer）。

整个德国都由等级制层层组织。最高元首当然是希特勒，然后有从上到下的领导者。而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是“管理者”。企业的工人被命名为 Gefolgschaft，这个词语在中世纪代表着封建领主的随从。所有这些人都不得不服从某个机构发出的命令，该机构名字超长：Reichsführerwirtschaftsministerium（经济部），其首脑是那个身上缀满了珠宝和奖章的著名胖子，名为戈林。

这个名字超长机构的部长向每个企业发号施令：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从哪儿获取原材料以及原材料的价格，产品以什么价格出售，出售给谁。工人们接到命令在某个指定的工厂工作，工资由政府法令规定。整个经济体系的每一个细节都由政府监管。

管理者没有权利享有利润，他的所得相当于工资，如果他想拿更多的钱，他说，例如：“我病得很重，需要立即手术，手术费要 500 马克，”然后他不得不询问地区领导人，他是否有权在所发工资之外领到更多的钱。价格不再是价格，工资也不再是工资，都成了 socialism

下的定额数目。

现在让我告诉你这种体系是如何崩溃的。多年的战争之后，某天外国军队抵达德国，他们试图维持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但是这种体系必然要求希特勒式的暴行，舍此必会失效。

而当德国上演这一切时，英国——在二次大战期间——恰恰也是象德国这样做的。从仅仅管制某些商品的价格开始，英国政府开始一步步越来越多地控制经济（与希特勒甚至在战前的和平时所采取的方式相同），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几乎已达成了纯粹的 socialism。

英国的 socialism 并非是 1945 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带来的。而是在战争期间，经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相的政府转变为了 socialism。工党政府仅仅是保留了丘吉尔政府已引入的 socialism。尽管遭到了人们极大反对。

英国的国有化并不意味着什么；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只是换了个名义，因为英格兰银行早已完全由政府控制。铁路和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是一样。所谓的“war socialism”——意味着干预主义的体系一步步前进——实际上经济体系已经国有化了。

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并不重要，因为谁经营都是由政府任命，而且在这两个国家，他们都必须服从政府各方面的命令。如我前述，

德国纳粹的制度保留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标签和术语，但其代表的意义已全然不同：只剩下了政府命令。

英国的体制也是如此。当英国保守党重新掌权后，撤销了一些管制。现在英国，一方面试图保持管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废除管制。（但不要忘了，英格兰的情形完全不同于俄罗斯）。那些食品和原材料依赖进口因此必须出口工业品的国家也是如此。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的国家，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体系无法运转。

因此，就剩下的经济自由而言（一些国家仍有实质的自由，如挪威、英国、瑞典），自由之所以存在，是保持出口贸易的需要。之前我选择牛奶为例，不是因为我对牛奶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最近的几十年中，几乎所有政府或大部分政府都对牛奶、鸡蛋或黄油实施了价格管制。

我想简单介绍下另一个例子：租金管制。如果政府管制租金，后果之一是那些在家庭条件变化时本应从大公寓搬到小公寓的人，将不再这样做。例如，孩子已经 20 多岁离开了家，结婚了或去其他城市工作，只剩下父母在家。这样的父母常会换一套更便宜的小公寓。如果实施了租金管制，这种必要性就消失了。

20 年代早期，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牢固地确立了租金管制。在租金管制的情况下，一套普通公寓的房东能拿到的租金不超过市内汽车票价的

两倍。你可以想象，租房的人没有任何动力搬家。而且，另一方面，再没有新建的房子。类似的租金管制在二战后的美国也很盛行，许多城市延续至今。

美国许多城市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其主要原因租金管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住房短缺。因此政府耗费数十亿美元修建新屋。但为什么会有这种住房短缺呢？住房短缺与牛奶价格管制下牛奶短缺是同样的原因。这意味着：当政府干预市场时，它将日益转向 socialism。

而这也回应了某些人，他们说：“我们不是 socialism，我们不想政府控制一切。我们知道这很糟糕。但政府为什么不能只对市场干预一点点呢？为什么政府不能去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呢？”

这些人谈论“中间道路”。他们没看到的是，孤立的干预，也就是只干预经济体系的一小部分，所导致的情形，会比政府自己以及那些要求干预的人所想要消除的情形更糟糕：那些要求租金管制的人发现公寓和住宅短缺时会愤怒不已，而住房短缺恰恰是由政府干预造成，因为所确定的租金低于人们在自由市场上所付的价格。

第三条道路的观念——介于 socialism 和 capitalism 之间，如其支持者所说，该体制既不同于 socialism 也不同于 capitalism，它保留了二者的优点而摒弃其缺点——纯粹是荒谬的。相信有这种虚妄体制的人会满

怀诗意地赞美干预政策的功绩。只能说他们错了。他们也不会喜欢所赞美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糟糕状况。

以后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是保护主义。政府试图将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隔离，它引入关税使进口商品在国内售价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使得国内生产商能够形成卡特尔。然后政府又打击卡特尔，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反卡特尔的立法是必要的。”

这恰恰是大多数欧洲政府所面临的情形。在美国，尚有其他原因解释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反对垄断幽魂的战役。

这太荒唐——政府自己的干预一手创造了出现国内卡特尔的条件，又指责企业，声称：“因为有卡特尔，因此政府必须干预商业。”要避免卡特尔，最简单不过的是终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干预，才可能有卡特尔。

把将政府干预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的每个国家，最终都至少会导致不满，而且常常混乱不堪。如果政府不及时住手，必将导致 socialism。

然而，政府干预商业一直盛行。有人一旦不喜欢这世界上发生的什么事，他就说：“政府该管管这事。我们要政府做什么？政府就该管这

些。”这是典型的旧时代残余思想，是现代自由出现之前、现代立宪政府出现之前、代议制政府或现代共和主义出现之前的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思想

千百年来，每个人都持有并接受这样的信念——君权神授，国王是上帝的使者；他英明神武，远胜臣民，因而他享有超凡权力。迟至 19 世纪初，人们仍然期望神圣的触摸即国王用手触摸来治愈某种疾病。医生通常是更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让病人试试国王治病。

认为家长制政府具有优越性，以及世袭国王拥有超自然超人类能力的这种信念逐渐消失了，至少我们这样认为。但现在它又卷土重来，一位世界知名的德国教授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我很了解他，他是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也是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名誉会员。这位教授写了本书，英文译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有法文译本，很可能也有西班牙文译本——至少我希望有，这样你们就可以确认我的话了。在这本我们当代而非黑暗的中世纪出版的书中，经济学教授桑巴特竟然这样说：“元首，我们的元首（他所指的当然是希特勒），其旨意直接得自宇宙之主的上帝。”

我先前提到希特勒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中，我将希特勒称为最高元首。但据桑巴特教授所言，还有个更高的元首便是上帝，上帝是宇宙之主。他写到，上帝直接对希特勒下旨。当然，桑巴特教授非常谨

慎地说：“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和希特勒交流。但是事实无可否认。”

现在，你如果听到这样一本书能够以德语出版，以一度被赞誉为“哲学家和诗人的国度”所用的语言出版，而如果你还看到它被翻译成了英语或法语，那么，如果某个小官员甚至都认为他比公民更聪明更优秀，而且想干预一切，即使他只是个可怜的小官，而不象著名的桑巴特教授那样享有各种荣誉，你也绝不会感到有丝毫的震惊。

有什么办法来纠正这些情形呢？我想说，有一种办法。这种救济来自于公民的力量；公民必须阻止妄称自己比普通公民更英明的 autocratic regime 的建立。这是 freedom and serfdom 最根本的区别。

Socialist nations 给自己加上民主的术语。苏联人称自己的体制为 “a People's Democracy”；他们很可能认为，人民由 the person of the dictator 代表。我认为，阿根廷的 dictator，胡安·庇隆（Juan Perón），1955 年被迫下台是其应得的好下场。让我们期待，其他国家所有 dictators，都得到类似的下场。

第四讲：通货膨胀

如果鱼子酱和土豆一样供应充足，那么鱼子酱的价格——也就是说，鱼子酱与货币的交换比率，或者鱼子酱与其它商品的交换比率——将会明显不同。那样的话，人们得到鱼子酱的代价将远小于今日所需。与此类似，如果货币数量增加，那么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将减少，一单位的货币所能得到的产品数量也会减少。

16 世纪时，美洲的金山银矿被发现并开采，大量贵金属运到欧洲。货币数量大增，致使欧洲物价普遍趋于上涨。今天也是同样，若政府增加纸币数量，结果就是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开始下降，由此物价上涨。这被称为通货膨胀。

不幸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些人更多地认为通货膨胀是因为物价上涨，而非货币数量的增加。

然而，还从未有过任何严肃的讨论来反对这种经济学解释，反对就价格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也即是货币与商品、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换率）做出的这种经济学解释。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没有比生产印着一定货币金额的纸张更容易的事了。美国的所有纸币都是一样

大小，印刷一张一千美元的纸币不会比一张一美元的纸币成本更多。这是耗费完全相同数量的纸张墨水的印刷过程。

18 世纪，当首次尝试发行银行券，并授予其法定货币之性质时——也就是说，银行券被授予了如金银那样在交易中支付的权利——政府和国家相信，银行家有某种秘诀，能无中生有地生产财富。当 18 世纪的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之时，它们认为若要摆脱困境，所需不过是一位精明的银行家来主导财政管理。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些年，法国皇室陷入财政困难，法国国王找到了这样一位精明的银行家，并授以高位。这人各方面都与法国此前的统治者截然相反。首先，他不是法国人，他是外国人——来自日内瓦的瑞士人雅克·奈克尔（Jacques Necker）。其次，他非贵族一员，仅为一介平民。而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可能更要命的是，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

于是奈克尔先生，也即著名的斯塔尔女士（Madame de Stael）之父，成了法国财政部长，每个人都盼望他来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但即使奈克尔先生深得信赖，皇室的金库仍空空如也——奈克尔最大的错误是试图资助独立战争中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与英国作战，而又不增加税收。这当然是解决法国财政困难的错误之道。

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没有灵丹妙药；政府需要钱，就只能向公民征税来筹资（或者，在特殊情况下向有钱人借款）。但是有许多政府，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政府，认为还有另一种方式来得到所需金钱：直接把钱印出来。

如果政府想做善事——比如，它想建一家医院——那么，得到项目所需资金的办法就是向公民征税，并以税入来修建医院。这样，就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价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因为如果政府征税来修建医院，则公民交税以后就会被迫减少开支。纳税者个人要么得减少消费，要么得减少投资或储蓄。

而政府代替公民个人，以买家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公民虽然减少了支出，但政府却增加了支出。当然政府购买的商品不会总与公民原本打算购买的完全一样；但平均而言，并不会因为政府修建医院就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我选医院为例，正是因为人们有时候会说：“区别在于政府花钱的目的是好是坏”。我假设政府印钱总是为了用于可能的最好目的——我们都赞同的目的。这是因为，并非花钱的方式，而是政府获取金钱的方式造成了我们称之为通货膨胀的那些后果，而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通货膨胀不是什么好事。

例如，不采用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利用税入来雇佣新员工，或为已在政府任职的人加薪。于是，这些得到了加薪的人，就能够买更多的东西。如果政府向公民征税，用来为政府雇员加薪，纳税人能用于支出的钱就少了，但政府雇员的钱增加了。价格整体上不会上涨。

但如果政府不是用税款，而代之以用新印的货币来做这件事，那就意味着，有人的钱会变多，而其他人的钱则保持不变。于是，得到了新印的货币的人会与从前的买家相竞争。由于商品比起以前并没有增加，但市场上的货币增加了——并且，比起以前，有人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东西——这样就会对同样数量的商品产生额外的需求。因此，价格就会上涨。这不可避免，不管新印的货币要用来做什么。

而更为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趋势会一步步发展；这种趋势不是所谓的“价格水平”（price level）的整体性上升。永远不要使用“价格水平”这种比喻性表述。

当人们谈到“价格水平”时，他们脑子里想到的是某种液体的平面，这种液体随着其数量的增减而升降，然而，就如容器中的液体一样，总是均匀上升。但就价格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平面”。价格并不是在同一时间以同等程度变化。总有些价格变化得更为迅速，涨跌都比其他价格更快。这是有原因的。

比如前例，政府雇员得到了货币供应中新增的钱。人们今天购买的商品，其品种数量不会恰恰与昨天购买的完全一样。政府已经印出来并投放市场的新增货币不会用以购买所有的商品和服务，而是用以购买特定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与此同时，其他商品仍然维持着新增货币投入市场之前的价格。因此，当通货膨胀开始时，国民中的不同群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最早得到新增货币的群体会得到暂时的收益。

如果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是为了打仗，它一定要买军火，因此，军工业及其从业人员就最先得到新增货币。这些群体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有更高的利润和更高的薪水；生意兴隆。为什么？因为他们最早得到新增的货币，现在有了更多的货币可供支配，他们就去购物，从其他一些制造和销售其所需商品的人那里购物。

这些制造和销售军工从业者所需商品的人构成了第二梯队。这个第二梯队也认为通货膨胀对他们的生意大有好处。怎么不是呢？销售更多不是非常好的事么？比如，军工厂附近的餐馆老板会说：“这真是太棒了！军工厂的工人有了更多的钱；他们来这里吃饭的人比以前多得多；他们都来光顾我的餐馆；我太高兴了！”他找不到任何理由不这样想。

情况是这样：先得到新增货币的人有了更高的收入，他们仍能以从前

的价格（也就是存在通货膨胀之前的状态下的价格）购买许多商品和服务。因此，他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由此，通货膨胀一步一步持续发展，从国民中一个群体扩展到另一个群体。所有在通货膨胀早期得到新增货币的群体都将受益，因为他们仍然能以反映先前货币与商品交换比率的价格买到一些东西。

但国民中也存在其他的群体，很久以后才得到新增货币。这些人就处于不利地位。在他们得到新增货币之前，他们被迫为某些——甚至为几乎想买的所有商品支付超过以前的高价，而他们的收入却保持不变，或者没有与价格同比例增长。

考虑某个国家的例子，比如二战期间的美国。一方面，当时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军工厂的工人，军工业，枪炮制造业，而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不利于国民中的其他群体。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教师和牧师。

如你所知，牧师是非常谦虚的人，侍奉上帝，不能多谈钱的事。教师也类似，是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应该多关心教育年轻人，而不是多考虑薪水。其结果是，教师和牧师位列通货膨胀最大受害者之中，因为许多学校和教堂都是到最后才意识到必须给他们加薪。当教堂长老们和学校机构最后才发现，终究，也必须为这些奉献身心的人加薪时，他们早期所受损失却无法弥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只能减少购买，削减价高质优的食品消费，限制购买衣服——因为价格已经上调，而他们的收入、他们的薪水，还没有上涨。（这种情况在今天已大有改观，至少对教师而言如此。）

因此，国民中不同的群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各不相同。对其中一些群体而言，通货膨胀不是坏事；他们甚至要求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因为他们是首先得利的人。在下一讲中我们会看到，通货膨胀后果的这种非均匀性是如何显著地影响了政治，而这种政治又导致了通货膨胀。

在通货膨胀带来的这些变化之下，有些群体受益，还有些群体直接“牟取暴利”（profiteering）。我用“牟取暴利”这个词不是要谴责这些人，因为如果有人要被谴责的话，该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政府。而总会有人喜欢通货膨胀，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暴利是因通货膨胀过程必然不均匀所致。

政府可能认为，通货膨胀作为筹集资金的方式比征税为好，征税总是不受人欢迎，而且困难。很多富强之国的立法者常常花好几个月讨论新增税收的各种形式，因为议会决定要增加支出，因此必须要增加税收。在讨论了以税收来获得资金的各种方式之后，他们最后决定，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做可能更好。

但是当然，不会用到“通货膨胀”这个词。掌权的政客推行通货膨胀

时不会宣布：“我要实施通货膨胀了！”用来实现通货膨胀的技术手段如此复杂，让普通公民意识不到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了。

史上最大的通货膨胀之一是一战后的德国。战争期间通货膨胀还不是那么严重，而战后的通货膨胀导致了灾难。政府并没有说：“我们在实施通货膨胀。”政府只是以非常间接的方式从央行借钱。政府不需要询问央行怎么才能找到钱借出来，而央行不过印钱而已。

现在，由于支票货币的存在，通货膨胀的技术变得很复杂。这包含了另一项技术，但结果一样。政府大笔一挥，创造出法币，由此增加了货币量和信用量。政府只要签发指令，就产生了法币。

一开始时，政府不在乎有些人会遭受损失，不在乎物价会上涨。立法者说：“这是个好得很的制度！”但是这个好得很的制度有一个根本性的缺点：它不可持续。如果通货膨胀能够永远继续，告诉政府不该通货膨胀就没意义了。但是关于通货膨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迟早它得结束。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政策。

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以通货的崩溃而告终结；它演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就如德国 1923 年时的情况。在 1914 年 8 月 1 日时，1 美元价值 4 马克 20 芬尼。9 年零 3 个月后，1923 年 11 月，1 美元等于 4.2 万亿马克。换言之，马克成了废纸，再没有任何价值。

多年前，著名学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道：“就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我很遗憾地说，确实如此。但问题是，短期又有多长呢？18世纪有位著名的女士，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她因“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宣言而闻名于世。蓬巴杜夫人很幸福，因为她死得早。但是她的继任者杜芭莉夫人（Madame du Barry），活过了短期，但在长期，被砍了头。对很多人来说，“长期”很快变成了“短期”——而通货膨胀持续得越长，“短期”就来得越快。

短期能持续多久？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能持续多久？很可能只要人们相信政府迟早，但不会太久，就会停止印钞，从而停止单位货币贬值的话，通货膨胀就仍可继续。

当人们不再相信这点时，当他们意识到政府将一直继续，不打算停下，他们就开始认识到明天的价格会比今天更高。于是他们不管什么价都抢购，导致价格涨上天，以至货币系统崩溃。

我引用德国的例子，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有许多书籍描述那时发生的事。（虽然我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但我是身在其中来观察这一切：在奥地利，情况与德国没有太大区别；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没有太大区别。）好几年间，德国人都相信他们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结束。他们相信这点，长达几乎九年，直到1923年夏天。

然后，终于，他们开始怀疑。随着通货膨胀继续，人们认为明智的做法是有什么就买什么，而不是把钱装在口袋里。而且，他们发现不应该借钱给别人，相反，去借别人的钱是个好主意。于是通货膨胀陷入恶性循环。

这样的情况持续，确切地说，持续到 1923 年 11 月 20 日。群众过去曾相信通货膨胀的货币是真实的货币，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情况已经变了。在德国通货膨胀的末期，1923 年的秋天，德国工厂每天早上向工人预付当天工资。工人则带着妻子来上班，马上把他的工资——他得到的数以百万计的全部工资——交给他妻子。于是她立即去商店买点什么，不管什么都行。她意识到（在那时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过一晚上，到第二天，马克的购买力就减少一半。货币就象是热炉子里的巧克力一样在人们的口袋里融化。德国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没有持续太久；几天之后，整个噩梦都结束了：马克已一文不值，必须建立新的货币体系了。

凯恩斯爵士，也就是那个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的那个人，是 20 世纪支持通货膨胀的一长串学者中的一个。他们都写文反对金本位。凯恩斯攻击金本位，称之为“野蛮的遗迹”（barbarous relic）。而现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谈论重返金本位荒谬可笑。比如说，在美国，如果你说：“美国早晚都得恢复金本位”，人们会认为你大概是在做梦。

然而，金本位有个巨大的优点：金本位下的货币数量独立于政府和党的政策。这就是它的优势。这是对抗挥霍无度的政府的一种保护形式。在金本位下，如果要求某个政府为某些新东西增加开支，财政部长就可以这样说：“我到哪里去找钱？先告诉我怎样为新增的开支找到钱？”

在通货膨胀系统下，对政客而言，没有什么比命令政府的印钞机构为其项目提供所需数量的货币更容易的事了。在金本位下，稳健的政府更有优势，其领导可以告诉人民，告诉政客：“我们做不到，除非增税。”

但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会养成习惯，认为政府是一家拥有无穷手段的机构：政府无所不能。比如，如果国家需要新建公路系统，就期待政府来建。但政府到哪里去找钱？

人们会说，现在的美国——甚至在过去，在麦金利治下——共和党或多或少支持稳健的货币，支持金本位，而民主党支持通货膨胀，当然那时不是纸币的通货膨胀，而是白银的通货膨胀。

然而，正是一名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总统，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否决了国会的一项决定。国会决定拨一小笔款——大约 1 万美元——来救济一个遭了灾的社区。克利夫兰总统为他的否决行为辩护，

写道：“虽然公民的职责是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但政府的职责不是为公民提供（财政）支持。”这句话应该写在每个政治家办公室的墙上，给那些来要钱的人看。

不好意思，我必须得简化这些问题。货币制度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如果像我在这里描述的那么简单的话，我也就不用写那么多长篇大论了。但是基础的问题正是这些：如果你增加货币量，就会导致单位货币购买力降低。那些个人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不喜欢这样。不能从通货膨胀中得益的人就会抱怨。

如果通货膨胀是坏事，并且人们意识到了这点，那为什么它却几乎成了所有国家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某些最为富裕的国家亦深受其害？现在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有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当你在美国旅行时，你会发现，不断有人谈论通货膨胀，谈论必须要阻止它。但他们只说不做。

告诉你一些事实：一战之后，英国的英镑回到了战前的黄金平价。也就是说，这高估了英镑。这提高了每个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在一个无阻碍的市场上，名义货币工资本应该下降来弥补这点，而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会遭受损失。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其原因。但英国的工会在单位货币购买力上升的同时，却不愿意接受工资率下调。因此，实际工资由于这一货币措施而显著上涨。这对于英国是场严重的灾难，

因为英国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必须进口原材料、半成品和食品才能生存，并且必须出口制成品以支付进口成本。英镑的国际价值上涨，外国市场上的英国货物价格随之上涨，于是销售和出口下降。实际上，英国自己定的价格把自己逐出了世界市场。

工会是不可战胜的。你知道现在一个工会有多大的权力。它有权，实际上是有特权，采用暴力。于是可以说，工会的命令和政府法令一样管用。政府法令是有强制执行力的命令，为此，政府的强制执行机制——警察——随时待命。你必须遵从政府法令，不然警察就会找你麻烦。

不幸的是，现在，几乎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有权实施暴力的第二势力：工会。工会决定工资，并以罢工来实施其工资决定，便如政府颁布了一项最低工资的法令一样。眼下我不打算多讨论工会的问题，以后再说。我只是想表明，正是工会政策将工资提高到了无阻碍市场应有水平之上。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潜在的劳动力得不到雇佣，除非雇主或工厂愿意赔本。而既然做生意就不能长期承受亏损，他们就只好关门，这些人就失业了。将工资率定在高于无阻碍市场应有水平之上，总会导致很大一部分潜在劳动力失业。

在英国，由工会强加的高工资率的结果就是长期失业，年复一年。数百万工人失业，产量下降。甚至专家们都困惑不解。在此情况下，英

国政府采取了一项行动，它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紧急措施：它贬值了其通货。

其结果是工会过去一直坚守的货币工资虽然没变，但工资的购买力改变了。真实工资，也就是以商品来衡量的工资减少了。现在工人能买的东西没有以前多了，即使名义工资率还是一样。人们认为，以这种方式，就能让真实的工资率恢复到自由市场应有的水平，于是失业就会消失。

这种贬值措施被许多国家采用，如法国、荷兰以及比利时等。有个国家甚至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就贬值了两次，这个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这是以一种秘密方式来挫败工会权力。然而，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

过了几年，人们——也就是工人，甚至工会，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认识到货币贬值减少了他们的真实工资。工会有权力反对。在许多国家，工会在工资合同中加入了一个条款，规定货币工资必须随物价上涨而自动提高。这称为物价指数。工会有了物价指数的意识。因此，英国于 1931 年肇始，后来被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采用的这个减少失业的办法，“解决失业”的办法，现在就不再起作用了。

不幸的是，凯恩斯爵士于 1936 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

书，将这种方式——这种在 1929-1933 年大萧条期间采用的紧急措施——抬高为一项原则，成为了制定政策的基本制度。而实际上，他以这样的说法来证明其正当性：“失业是件坏事。如果你想要失业消失，你就必须通货膨胀。”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就市场而言，工资率是过高了，也就是说，这么高的工资率使得雇主若要增加人手就会无利可图，因此，从工作人口的整体来看，这是太高了，因为只有一部分渴望挣钱的人能按工会强加的高于市场的工资率找到工作。

凯恩斯确实认为：“年复一年的大量失业当然是令人非常不满的状况。”但他并没有提出，工资率能够也应该按市场的情况调整，他反而说道：“如果让通货贬值，而工人们不够聪明，意识不到的话，那么只要名义工资率不变，他们就不会坚持反对真实工资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凯恩斯爵士认为，如果某人今天得到的先令与通货贬值前一样多，他就不会意识到他的收入事实上减少了。

用老话说，凯恩斯提议欺骗工人。他不但没有公开地宣称工资率必须按市场状况调整（否则，就不可避免有一部分劳动力会长期失业），而且他其实是说：“只有进行通货膨胀，才能实现完全就业（full employment）。必须欺骗工人。”然而，最有意思的是，当他出版《通论》时，已不可能再欺骗工人了，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物价指数。但完全就业的目标还在。

“完全就业”是什么意思？这只有在无阻碍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就是不受工会或政府操纵的市场上才能实现。在这个市场上，每种劳动的工资率都趋于达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每个想找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作，而每个雇主都能雇到所需数量的工人。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工资率则趋于上涨，而如果只需要更少的工人，工资率就趋于下降。

唯一能带来“完全就业”情况的方式就是保持无阻碍的劳动力市场。这点对每种劳动和每种商品都是适用的。

一位商人想要以 5 美元的单价出售某种商品，他会怎么做？如果在这个价位上他卖不掉，美国的商业技术术语称之为“存货不动”（the inventory does not move）。但存货必须得动。他不能一直留着这些存货，必须买些新东西；流行趋势在变。于是他降价销售。如果他不能以 5 美元卖掉，就只能卖 4 美元。如果 4 美元卖不掉，只好卖 3 美元。他要想做生意就别无选择。他可能会遭到亏损，但这些损失是因为他预测该产品的市场时出了错。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从乡下来到城里，想要挣钱。每个工业国都是如此。对他们来说，情况也与商人销售商品一样。在美国，这些年轻人初进城时，比如说，认为他们每周能挣 100 美元。这可能不现实。那么，如果一个人找不到每周 100 美元的工作，他就得试着接受

每周 90 或 80 美元的工作，甚至更少。但是如果他说——如工会那样——“每周 100 美元或者什么都不要”，那么他或许只能一直失业了。

（许多人不介意没工作，因为政府支付失业补贴——来自向雇主征收的特别税——失业补贴有时候几乎与受雇能挣的工资一样高。）

因为某个群体相信只有实施通货膨胀才能实现充分就业，所以美国接受了通货膨胀。而人们讨论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要稳健的通货带来的失业；还是要通货膨胀带来的完全就业？其实，这是个非常有害的分析。

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问的是：怎样才能改善工人和所有其他群体的状况？答案是：通过保持无阻碍的劳动力市场，并由此达到完全就业。我们的困难是：让市场来决定工资率还是让工资率屈服于工会的压力与强制？问题不是“要通货膨胀还是要失业？”

在英国、在欧洲的工业国，甚至在美国都有人主张这个问题的错误分析。而有些人说：“看，甚至美国都在进行通货膨胀，我们为什么不该这样做？”

对这些人的回答首先是：“富人的特权之一就是犯起傻来，能比穷人撑的时间更长。”这就是美国的情况。美国的财政政策非常糟糕，而且日渐恶化。但或许美国犯起傻来，能比某些穷国撑的时间长点。

最重要的是记住，通货膨胀不是上帝的行为；通货膨胀不是自然灾害或爆发瘟疫的疾病。通货膨胀是一项政策——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制定政策的人诉诸通货膨胀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比失业好点。但事实是，不用太久，通货膨胀就不能解决失业了。

通货膨胀是一项政策，是政策就能被改变。因此，没有理由屈服于通货膨胀。如果认为通货膨胀是邪恶之事，那么就必须阻止通胀。必须平衡政府预算。当然，公共舆论必须支持这点；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人们理解。假如有了公共舆论的支持，那么民选代表当然就有可能废止通货膨胀的政策。

我们必须记住，就长期而言，我们都可能死掉，而且一定会死掉。但是，我们应该安排好我们凡尘俗世中的事务，因为短期内我们要生活，以尽可能好的方式生活。达到这一目的必要措施之一就是废止通货膨胀的政策。

第五讲：外国投资

一些人称自由经济计划为消极的计划。他们说：“你们自由主义者到底想要什么？你们反对社会主义、政府干预、通货膨胀、工会暴力、保护性关税...你们对所有的事都说不！”

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且肤浅的公式化论调。当然可以以积极的方式去设想自由主义计划。如果一个人说：“我抵制审查制度，”他并不消极；他支持作者拒绝政府插手而自行决定出版什么的权利。这不是消极主义，这正是自由。当然，在谈到经济制度时，我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一术语，所指的是古老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原文使用的“liberal”不是当代美国常见的“自由派”，即“左派”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译者注）。

今天，各国生活标准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大多数人对此心怀不满。两百年前，大英帝国的情形比今天的印度还差得远。但是 1750 年的英国可不称自己为“不发达”或者“落后”，因为并没有经济状况更好的国家与他们相比较。如今，所有没有达到美国平均生活水准的人们都认为自身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许多这种国家将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也因此向所谓的发达国家或者“过度发达国家”要求援助。

让我来解释下问题所在！造成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同类劳动的平均收入比一些西欧国家、加拿大、日本尤其是美国的平均收入要低。如果我们试图寻找原因，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工人或者其他劳动者的素质更差。北美的一些工人群体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他们比别人更强——即是说，他们因自身价值才挣到了比他国工人更高的工资。

如果美国工人能去别国看看——比如说，意大利，许多美国工人来自那里——就能发现，是因为国家的状况不同而并非他个人素质出众，使他有可能挣到更高的工资。如果一个人从西西里岛移民到美国，他很快会挣到美国普通水平的工资。但是如果他返回西西里岛，他就会发现美国之行并没有赋予他什么个人能力，让他能在西西里岛获得比与其相似的同胞更高的收入。

也不能假设美国之外的企业家才能低人一等来解释这种经济状况。虽然事实上，在美国、加拿大、西欧和亚洲的某些地区之外，工厂中所使用的设备和科技方法，大体而言比美国差些，但是这不能归咎于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们不重视。他们很清楚美国和加拿大有好得多的设备。他们知道一切应当知道的技术问题，如果他们真不知道，他们也有机会从传播这类知识的教科书或者技术杂志上学到这些必备知识。

重申一次：这种（生活水平）差异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个人的素质低下或者企业家不重视。差距是资本的供给，即可使用的资本商品的数量。换句话说，在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人均所拥有的资本投资额比发展中国家要多。

一个商人支付给一个工人的工资，不可能多于工人为产品所增加的价值，不可能多于消费者打算为这个工人创造的附加值所支付的价格。如果支付更多，他从消费者处的所得就不能覆盖支出，就会产生亏损，正如我反复强调且众所周知的是，一个商人如果产生亏损，他就会改变运营模式，要不就是破产。

经济学家描述这种状况为“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实际上，工资范围由一个人的工作为产品所增加的价值额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使用更好或者更有效率的工具，那么一个小时内他生产的产品要比同样时间内用较差的工具工作的人多得多。显然，在配备了最先进工具和机器的美国鞋厂里工作的100个工人、比不得不使用过时的工具和老套生产工艺的印度工厂中100个工人，在同样时间内，可生产出多得多的产品。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老板很清楚更好的工具会让企业更有利可图。他们很乐意建造更多更好的工厂。唯一的阻碍是资本短缺。较不发达的国

家和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一个时间函数：英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早开始储蓄；更早积累资本并进行投资。正因为启动更早，在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生活水平仍较差时，英国就拥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准。逐渐地，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开始研究英国的情况，而它们不难发现英国致富原因，因此纷纷起而效之。

其他国家起步晚，而且英国并没有停止资本投资，因此其他国家与英国相比仍有巨大差距。但是有件事导致了英国丧失原有的领先地位。

19 世纪发生了一件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大事，不仅仅涉及某个单独国家的历史。这就是 19 世纪国际投资的发展。1817 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仍然认为资本天经地义只能在一国之内进行投资，资本家不应该试图投资国外。但是几十年后，国际投资开始在世界经济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没有资本投资，比大英帝国落后的那些国家，必须以英国 18 世纪初中期所使用的方法和技术起步，缓慢地，一步一步地试图模仿英国之前的所作所为——那样就会始终远远落后于英国经济所拥有的技术水平。

那么，这些国家将花费许多许多年以达到英国在 100 年前或更早就已达到的技术发展水平。但是国际投资这一伟大的事件帮助了所有这些

国家。

国际投资意味着英国资本家将英国的资本投资到世界其他地方。他们首先投资的是一些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英国人眼里既缺钱又落后。众所周知，欧洲大部分国家和美国的铁路都是在英国资本的帮助下建设成的。在这里——在阿根廷也是同样。

以前欧洲所有城市的瓦斯公司都是英国的。1870 年中期，一个英国作家兼诗人批评了他的同胞。他说“英国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古老的智慧，再没有新的思想了。他们再也不是世界上重要的或者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了。”但是伟大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回答说，“看看欧洲大陆。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亮着灯，是因为有英国的瓦斯公司提供瓦斯。”当然，汽灯对于我们而言似乎是很“遥远的”年代了。斯宾塞更进一步回应这位英国批评家，他补充道，“你说德国人远远领先于大英帝国。但是看看德国。甚至是柏林，德意志人的首都，德意志精神的首都，如果英国瓦斯公司没有侵入这个国家并点亮这些街道，它也将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同样，英国资本发展了美国的铁路和其他许多工业部门，当然，既然一国引进资本，其贸易平衡就被那些伪经济学家们称为“不良”。这意味着进口远大于出口。贸易平衡被认为有利于英国（而不利于美国）的原因竟然是，英国的工厂为美国送去了各种各样的设备，而这些设

备无须花钱购买，只须折算成美国公司的股份。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段历史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90 年代。

美国一开始得到英国资本的扶持，后来在它自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政策帮助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了自身的经济体系，美国人开始回购那些以前卖给外国人的股票。这样美国的出口就超过了进口。差额被从外国人那里收购美国公司普通股票的方式弥补了——有人称之为“遣送”。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战。接下来发生的事得另当别述。这是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的美国对于参战国的补助金：放贷，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加上租借，国际援助，马歇尔计划，送到海外的粮食，以及其他援助。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人们有时候觉得有国外资本在自己的国家里运作是件很丢人很羞愧的事。但你必须认识到，除了英格兰，在所有的国家中，国际投资都在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

如果我说国际投资是 19 世纪发生的最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你应该想到如果没有国际投资，所有的这些东西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亚洲所有的铁路、海港、工厂和矿场，还有苏伊士运河和许多西半球的东西，如果没有国际投资，根本就不可能被建造出来。

只有人们能够认为，不会被强制征收时才会有国际投资。如果他事先知道有人会没收他的投资，就没有人会进行任何投资。在国际投资兴起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没有没收国际资产的问题。最初，一些国家对外国资本显示出某种敌意，不过他们的大多数都意识到了他们从国际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有的情况下，外国投资并不直接由外国资本家投资，而是间接地借贷给外国政府，然后政府用这些钱投资，比如俄罗斯。出于纯粹的政治因素，一战前的 20 年里法国投资了俄罗斯 200 亿金法郎，主要借贷给俄罗斯政府。俄罗斯政府所有伟大的事业——例如，连接乌拉尔山两侧的俄罗斯国土、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太平洋的铁路，几乎都是由外国政府借贷给俄罗斯的资金所修建。你知道，法国政府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俄罗斯会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府上台，并且直截了当宣布它不会为前任沙皇政府所欠下的债务埋单。

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段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发动了针对国际投资的公开战争。既然没有阻止政府没收投资的救济制度，那么实际上，当今世界就没有对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资本家们对此没有预见，如果那些资本输出国的资本家们意识到了这点，那么所有的国际投资 4、50 年前就会终结。但是资本家们不相信有哪个国家会如此不道德，不承认自己的债务、没收查抄外国资本。正因这些举动，世界经济史翻开了新的一章。

随着这一伟大时代，国际投资帮助发展的时代——19 世纪的终结，世界的各个方面，现代运输工具、制造业、矿业、还有农业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中，政府和政党都认为外国投资者是剥削者，应该被驱逐出国。

俄罗斯并不是抵制资本家的这场浪潮的唯一罪人。比如，记得墨西哥曾没收美国的油田，而且在这个国家（阿根廷）发生的所有事情也无需我废话。

现今世界的状况，由没收外国投资的体系所创立，包括直接没收，和通过外汇管制或税收歧视的方式进行的间接没收。这一直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以印度——存在上述问题的最大国家之一为例。印度在英国的体制下，英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也有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被投资到印度。因为投资关系，英国出口到印度的别的东西也不能不被提及，他们给印度带来了抵抗传染病的现代方式。这导致了印度人口的惊人增长，相应地增加了这个国家的麻烦。面对如此糟糕的状况，印度转而将没收作为一种应对之策。但不全都是直接没收；政府骚扰外国资本家，限制他们的投资，以至于那些外国资本家被迫售出资产。

印度当然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积累资本：本国的资本积累。然而，印度对本国的资本积累也是一样痛恨。印度政府宣称想实现工业化，但是他们实际想要的是社会主义企业。

几年前，著名的政治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出版了一部演讲集，其目的是想让印度对国际投资更具有吸引力。印度政府在外国资本投资之前并不反对它。只有在它们投资之后，这种仇恨才滋生起来。这本书里讲到——我从书中原文引用——尼赫鲁说，“当然，我们想要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并不反对私企。我们想以各种方法鼓励私企。我们向那些对我国投资的企业家承诺，十年之内，我们不会对他们实行没收或者公有化，也许这个期限会更长。”他把这当成是一个欢迎到印度来的邀请函。

你们知道，国内资本的积累也存在问题。现今所有国家都对公司课以重税。实际上，公司承担双重税负。首先，公司的利润会被收取重税，然后，公司付给股东们的红利会再次被收税。而且这种做法愈演愈烈。

对收入和利润征收越来越多的税意味着，正是那些人们本可用以储蓄或者投资的一部分收入被征收走了。以美国为例。几年之前，有一种超额利润税，每挣得一美元，公司只能留下 18 美分。当这 18 美分支付给股东们时，那些拥有大量股份的股东必须另外交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或者更多的税。结果是，1 美元的盈利只能留下 7 美分，剩下的 93

美分都交给了政府。这 93%本来可以用作储蓄或者投资，都被政府拿去用于当前的花销。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我想我已说得很清楚，美国的政策并不值得他国效仿。这个政策实在太糟糕——简直是疯了。我唯一想说的是，富国较之穷国能承受更多的糟糕政策。在美国，尽管有各种名目的税收，但每年还是有增加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而且生活水平仍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但在其他国家，这种问题已十分危急。没有，或者说没有足够的国民储蓄，而且因为这些国家对国际投资的公开敌意，来自国外的资本投资也明显减少。如果努力方向适得其反，怎么谈得上工业化、发展新计划的必要性、改善境遇、提高生活水平、享有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交通工具呢？他们的政策所真正致力的是阻止或者减缓国民资本的积累并阻碍外国资本的进入。

结果当然非常不妙。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丧失信心，而且现今世界对国际投资越来越不信任。即使有国家考虑立即改变政策，并且实现所有可能的承诺，也未见得会再次激励国外资本家来投资。

当然，有办法避免这种结果。可以订立一些国际法规，而不仅仅是协议，这样外国投资就可从国内司法权下逃出生天。这是联合国该做的事。但是联合国仅仅是进行无谓争论的聚会场所。意识到国际投资的

巨大作用，意识到仅是国际投资就可以改善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应该有人站出来尝试从国际立法的角度做一些事情。

我认为，这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因为现在的处境尚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想让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美国一样，能够办到。唯一的问题是必须是认识到如何实现。

要使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一样繁荣，唯一缺少的只是一样东西：资本——当然还有在市场规则而不是政府规则下使用资本的自由。那些国家必须积累国内资本，而且也必须让国际资本流入本国成为可能。

就发展国民储蓄有必要再次指出，广大人民的国内储蓄预设了一个稳固的金融体。这意味着不会有任何形式的通货膨胀。

美国公司所营运大部分资本现在归工人自己所有，以及其他人以很不起眼的方式所有。数十亿的储蓄、债券、保险，在这些企业中运作。在当今的美国的金融市场，保险公司取代了银行成为最大借款人。保险公司的钱来自于被保险人的财产（不是法律意义上，而是经济意义上的财产）。实际上，每个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保险。

世界经济趋于平等的前提条件是工业化。而只有增加资本投资、增加

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你可能会感到吃惊，我没有提到被认为是实现工业化的首要方法。我所指的是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关税和外汇管控的确确意味着阻止资本进入和国家工业化。唯一可以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方法就是拥有更多的资本。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是将投资从商事活动的一个分支转向另一个分支。

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并不能为一国带来资本的增加。新建工厂需要资本。改良现有的工厂需要资本，而不是关税。

我不想讨论自由贸易或者贸易保护主义的所有问题。我希望你们的大多数教科书都能以正确的方式阐述。保护主义并不能使一国的经济状况变好。同样不能对经济状况有所贡献的是工会组织。如果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如果工资低，如果打工者看到美国，或从书中读到，或在电影中发现普通美国家庭奢享所有的现代舒适，他可能会嫉妒。他完全有权利说：“我们该拥有同样的东西。”但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增加资本。

工会组织用暴力抵制企业家们和那些他们称之为破坏罢工的人。尽管他们手握权力，使用暴力，但工会不能持续提高所有打工者的工资。同样无效的是政府颁布法令固定最低工资。工会最终带来的（如果他们成功地提高了工资的话）将是永久性的、持续性的失业。

工会不能使国家工业化，他们无法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最具有决定性的观点是：人们必须意识到，一国制定的意在提高生活水平的所有政策必须直接指向增加每单位资本的投资率。尽管有很多坏政策，美国的单位资本的投资率仍在增加。加拿大和一些西欧国家也同样如此。但很不幸的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资本投资率却在减少。

我们每天都在报纸上读到世界的人口越来越多，大概每年增加 4500 万或者更多人口。这样下去，结果会是什么？别忘了我提到的大英帝国。1750 年的英国人认为，6 百万人口生活在不列颠岛国就是可怕的人口过剩，会带来饥饿和瘟疫。但在二战前夕，1939 年，英国小岛上住了 5000 万人，而且生活水平之高，与 1750 年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所谓“工业化”的效果，而这个词远不足描述之。

英国的进步在于提高资本投资率。正如我之前所说，只有一个方法能使一国繁荣：如果你增加资本，你就增加了工人的边际生产率，结果是实际工资会上涨。

如果世界没有移民限制，那么全世界工资水平会趋于一致。如果今天没有移民限制，大概每年有 2 千万人想要移民美国。以挣更多薪水。这种流入会降低美国的工资，而提高其他国家的工资。

我没有时间来讨论移民限制的问题。但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方式也可

使全世界工资水平趋于一致，可弥补无法自由移民的缺憾，那就是资本的移民。资本家们喜欢向那些劳动力充足且价格合理的国家转移。他们带着资本进入那些国家，也带来了提高工资率的趋势。过去如此，将来同样也会如此。

当英国资本首次对外投资时，比如说奥地利或玻利维亚，那里的工资远远低于大不列颠。但在这些国家中增加的投资带来了提高工资的趋势，并扩散到全世界。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联合水果公司搬到了危地马拉，带来了提高工资的普遍趋势。联合水果公司提高了当地人的工资，其他老板也不得不提高工资。所以完全没必要对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悲观失望。

我完全赞同共产主义者和工会所说的“必须要提高生活水平。”不久之前，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一个教授这样说“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为什么世上的人还要如此辛苦工作？我们已拥有了一切。”我不怀疑那个教授已经拥有足够的一切。但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民，还有许多美国人，他们希望而且应当有更好的生活水平。

美国以外的拉丁美洲，还有亚洲和非洲，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国家的状况有所改善。更高的生活水平也会带来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文明。

所以我完全同意普遍提高生活水平这一最终目标。但我不同意为实现

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什么措施才能实现这一目的？不是保护主义，不是政府干预，不是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工会暴力（委婉地称之为集体谈判，实际上，是在暴力威胁下的谈判）。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如我所见，只有一条路！这是一种缓慢的方法。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太慢了。但是，没有通往人间天堂的捷径。这需要时间，而且必须努力。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耗时，而且最后会实现发展水平的均衡。

大约在 1840 年左右，德国西部（斯瓦比亚和符腾堡）是当时全世界工业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那里的人认为：“我们永远都不会达到英国的水平，英国人起跑时领先，就会永远领先我们。”三十年后，英国人说：“我们受不了德国人的竞争了，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抵挡。”在当时，当然，德国的生活水平正在迅速上升，即使在那时，也在接近英国的水准。而今天，德国的人均收入已根本不低于英国了。

在欧洲的中心，还有一个小国，瑞士，自然禀赋很差。没有煤矿，没有矿产，没有自然资源。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其国民始终追求资本主义政策。他们的发展已达到了欧洲大陆最高的生活水平，而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中心之一。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人口和面积都比瑞士要大得多，在实行良好政策一些年头之后，不能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我所指出的那样，

必须实行良好的政策。

第六讲：政治与观念

在启蒙时代，在北美独立的那些年，以及数年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之时，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情绪是乐观的。当时，所有的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完全相信，我们将开始一个繁荣、进步和自由的新时代。那时候，人们期待新的政治制度——已在欧美的自由国度建立起来的代议制宪政政府——会以非常好的方式运作，而且经济自由能够持续地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其中的某些期待是过于乐观了。无疑，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我们经历了经济状况前所未有的进步，多得更多的人由此能以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18 世纪哲学家们的许多愿望被彻底打碎了。他们希望不再有战争，不再需要革命。这些愿望未曾实现。

在 19 世纪，曾有一段时间，战争的数量下降，也不再那么残酷。但是进入 20 世纪，好战精神再次兴起，而我们完全可以说，磨难尚未结束，然而人类不得不继续。

始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宪政制度令人类失望了。研究过宪政问题

的大多数人（也几乎是所有的作者）都似乎认为，这一问题的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没有关联。因此，他们多是详尽研究代议制政体（人民代表组成的政府）的衰落，好像这一现象完全独立于经济形势，独立于决定人们行为的经济观念。

但这种独立性并不存在。人类并不是这样一种生物，有一面是经济的，有另一面是政治的，两面毫不相干。事实上，所谓自由的衰落，所谓宪政政府和代议制度的衰落，就是经济和政治的观念剧变的结果。这些政治事件是经济政策变化之必然后果。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奠定了新型政治制度的基础。他们的指导思想假定，一国之内所有诚实的国民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一终极目标就是整个国家的福祉，以及其他国家的福祉，所有正直之人都应献身于此。这些道德领袖和政治领袖完全相信，一个自由的国家无意于征服。他们设想的党派斗争都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就如何最好地处理国家事务而言，存在歧见是非常正常的。

在某个问题上持相似观点的人互相合作，而这种合作就称为党派。但某个党派的结构不是永久的。党派的结构并不取决于个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如果人们了解到他们原有的立场是基于错误的假定，基于错误的观念，就有可能改换党派。就此而言，许多人认为选战中的讨论，以及嗣后立法议会的讨论都是重要的政治因素。立法机构成

员的发言不是仅被认为在向世界宣告某个政党的需求。这些发言被认为是试图让对立的团体相信，该演讲人的主张比起他们以前听到过的说法更为正确，更有利于公共利益。

政治演讲，报纸的社论，小册子和书籍都是为了说服而写作的。如果某人的观点合理，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不能说服大多数人他自己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出于这种观点，19 世纪早期的立法机构才制定了宪法规则。

但是这意味着政府不干预市场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全体公民只有一个政治目标：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福祉。然而，恰恰是干预主义代替了这种社会和经济哲学。干预主义孵化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哲学。

在干预主义者的观念之下，政府有责任支持、补贴特殊集团，赋予其以特权。18 世纪的政治家的观念是立法者对公益有独到见解。但是在当今的政治生活现实中，我们所具有的，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没有任何例外，全世界所有非共产主义专政的国家都不再有传统的古典意义下真正的政党了，只有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

压力集团是牺牲其他国民的利益而为他们自己谋求利益的一群人。这种特权可能是就具有竞争力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可能是补贴，可能是禁止他人与压力集团成员相竞争的法律。无论如何都是给予压力集

团的成员以特殊地位。按照该压力集团的理念，给予他们的东西是其他团体所不能享有，或不应享有的。

在美国，从前的两党制度似乎仍然得以保留。但这只是真实情况的伪装。实际上，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由压力集团的斗争和愿望决定的。在美国，仍然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但是在两党中都有压力集团的代表。这些压力集团的代表更感兴趣的是与对方党派中同一压力集团的代表合作，而不是与他们自己党派的同仁们一起努力。

给你们举个例子，如果你与美国真正了解议会事务的人交谈，他们会告诉你：“此人是代表白银业集团利益的议员。”或者他们会告诉你另一个人代表的是小麦种植者。

当然，每个单独的压力集团肯定是少数。基于劳动分工体系，每一个致力于特权的特殊团体都必然是少数。而少数团体如果不与其他类似的少数团体、类似的压力集团合作，他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取得成功。在立法议会中，他们试图实现不同压力集团之间的联合，由此他们可能成为多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这种联合可能会瓦解，因为在有些问题上这些压力集团不可能达成一致，然后又形成了新的压力集团联合。

这就是 1871 年发生在法国的事，历史学家称之为“第三共和国的衰亡”（the decay of the Third Republic）。这不是第三共和国的衰亡，而只是压力集团这种制度不能成功地运用于大国政府的例证。

在立法机构中，有小麦业的代表，有肉业的代表，有白银业的代表，有石油业的代表，但最重要的是各种工会的代表。只有一件东西在立法机构中不被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人支持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而所有问题，甚至外交政策，都是从特殊压力集团的角度来看待的。

在美国，一些人口稀少的州对银价感兴趣，但并不是这些州的每个人都感兴趣。然而，数十年来，美国花费了纳税人大量金钱，用来在市场价格之上购买白银。还有个例子，在美国，只有少数人口从事农业，其他的人都是农产品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然而，美国的政策却是用几十亿几十亿的美元来维持农产品的价格高于潜在的市场价格。

不能说这项政策有利于占人口少数的农民，因为与农业相关的利益并不统一。奶农不喜欢谷物价高；相反更喜欢谷物价廉。鸡农希望鸡饲料的价格低廉。农业集团中有许多不能相容的特殊利益。然而，议会政治中的精明手腕使得人数很少的利益集团能够牺牲多数人以获得特权。

在美国有种情况特别有意思，关于食糖。或许 500 个美国人之中只有 1 人希望糖价高昂，而很可能 499 人都希望糖价低廉。然而，美国的政策是借助关税和其他特殊手段来尽力提高食糖价格。这项政策不仅损害了那 499 人作为食糖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与其他所有美洲国家合作，而其中一些国家希望能向美国销售食糖。他们希望能销售更多的食糖。压力集团的利益甚至会决定一国的外交政策，这个例子表明了这是怎么回事。

多年来，全世界的人一直在论述民主制度——关于主流的代议制政府。他们抱怨其不足之处，但是他们所批评的民主制度只是干预主义成为了治国之策的民主制度。

如今可能会听见人们说：“在 19 世纪早期，在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立法机构里的演讲与人类的重大问题相关。人们反抗暴政、为自由、为与其他所有自由国家的合作而奋斗。但是现在的立法机构里，我们更加务实了。”

当然我们更加务实了。现在的人不谈自由：他们谈的是要求花生涨价。如果这是务实，那么立法机构当然变化显著，然而并没有进步。

这些由干预主义带来的政治变化已经明显地削弱了国民和代表们的力

量，用以抵抗独裁者野心和暴君行径的力量。立法机构的代表们唯一关心的是满足投票者的愿望，比如，要求食糖、牛奶和黄油价高，小麦价廉（由政府补贴）。这些代表很难代表人民，他们根本代表不了全部选民。

赞成这些特权的选民没有意识到，还有需求相反的对手会阻止他们的代表取得完全的成功。

一方面，这种制度也导致了公共开支持续增加，另一方面，让征税更为困难。这些压力集团的代表想为他们的压力集团争取特权，却不想让支持者承受太重的税收负担。

立法者不代表整个国家，而只应代表选举他的地区的特殊利益，这不是 18 世纪现代宪政政府奠基者的观念，这是干预主义的后果之一。最初观念是立法机构的每个成员都应代表整个国家。他由某一特定地区推选，只是因为在那里他为人所知，对他有信心的人选了他。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进入政府是为了为其选民谋求特殊利益，并不意味着他会要求建新学校，或新医院，或新精神病院，这会导致他所在地区的政府开支明显增加。压力集团政治解释了为何所有的政府几乎都不可能停止通货膨胀。一旦当选官员试图限制花销，限制开支，支持特殊利益的那些人，从预算的特别项目中获利的那些人，就会宣称不能

从事这个项目，或必须实行那个项目。

当然独裁绝不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独裁不是自由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一个独裁者起初或许会做出各种承诺，但作为独裁者，他不会遵守诺言。相反，他立刻会压制自由言论，于是，几天，几个月或几年以后，报纸和立法机关的演讲者就无法指出，他在独裁开始时所说的与他后来所做的不一致。

我们看到今天在许多国家中自由的衰落，想到的是德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不久的过去所经历的可怕独裁。结果是，现在人们在谈论自由的衰亡和我们文明的衰落。

人们说，一切文明最终必然毁灭崩溃。这种看法有些著名的支持者。其中之一是德国教师斯宾格勒（Spengler），而另一位还更为有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文明现已衰老。斯宾格勒将文明比作不断生长的植物，但其生命最终会走到尽头。他说，文明也是如此。但是，将文明喻为植物完全是想当然。

首先，在人类的历史中，非常难以区分不同的独立文明。文明不是独立的，而是共生的，相互之间不断影响。因此，人们不能像谈论某株特定植物的死亡那样谈论某个特定的文明的衰落。

但是，即使你驳斥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学说，仍然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对比：衰亡文明之间的对比。无疑，公元 2 世纪时，罗马帝国培育了一种非常繁荣的文明，在其统治的欧亚非疆域中，有非常发达的文明。也有水平很高的经济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之上。虽然与我们今天的状况相比，它看起来相当原始，但它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其劳动分工程度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之前的最高水平。同样无疑的是，罗马文明崩溃了，特别是到了 3 世纪时。罗马帝国内部的这种崩溃，使其不能抵抗外部的侵略。虽然比起罗马在之前各个世纪反复抵挡过的侵略，这次的侵略也并不更严重，但罗马帝国内部出了事，他们再也无力抵抗。

出了什么事？有什么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一个帝国的崩溃，而这个帝国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 18 世纪之前的最高文明程度？真相是，摧毁这个古代文明的东西与威胁到我们今天文明的危险很相似，几乎一模一样：一是干预主义，一是通货膨胀。罗马帝国存在干预主义的事实是罗马帝国沿袭之前希腊的政策，没有放弃价格管制。这种价格管制是温和的，实际上没有产生任何后果，因为几百年来它都没有试图把价格压到市场水平之下。

但是，当 3 世纪时开始通货膨胀时，可怜的罗马人还未拥有我们实施通货膨胀的技术手段。他们不能印钱，只好降低硬币的成色，这比起现代的通货膨胀制度而言逊色多了。现在的制度凭借现代化的印钞机，

就能轻而易举地毁灭货币的价值。但那在当时也够用了，它产生了与价格管制相同的效果，因为官方所能接受的价格现在已经低于各种商品因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可能价格了。

当然，其结果是城市里的食品供应减少。城里人被迫回到乡下重新务农。罗马人从未认识到事情的原委。他们不能理解。他们尚未发展出思维工具来解释劳动分工的问题，解释通货膨胀对市场价格带来的后果。当然，他们清楚地知道，通货膨胀、通货贬值是坏事。

于是，皇帝以立法来制止这一趋势。法律阻止城市移居乡下，但这种法律没有效果。由于城里的人没有东西吃，他们快饿死了，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他们离开城市去务农。城市居民不能再作为工匠从事城里的加工业。而且，随着城市里的市场消失，人们也买不到任何东西了。

于是我们发现，从3世纪起，罗马帝国的城市逐渐衰落，劳动分工也不像从前那么密集了。最后，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家庭体系出现了，后世法律称之为“庄园”（villa）。

因此，如果人们将我们今天的状况与罗马帝国相比，认为“我们将重蹈覆辙”，他们这样说是有些道理的。他们能够发现某些类似的事实。但差异巨大。差异不在于3世纪下半叶主导性的政治结构。当时，平均每三年就有一个皇帝被暗杀，而杀害他的人或致死他的人成为其继

任者。平均三年后，新皇帝又会出同样的事。公元 284 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成为皇帝，他一度试图阻止衰败，但未成功。

今天的状况与罗马当时主流状况的巨大差异在于导致罗马崩溃的措施并非是有预谋的。我要说，它们不是那些应被谴责的正规学说的后果。

然而，相反，现代干预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观念，通货膨胀的观念，由学者和教授编造成正式学说，在学院和大学里讲授。你可能会说：“那今天的情况更糟糕。”我会回答：“不，并不更糟。”就我看来，情况更好些，因为观念可以被别的观念所击败。在罗马皇帝的时代，没人怀疑政府有权决定最高限价是个好政策。没人对此有争议。

但是由于我们有学校、教授和书籍推荐这种政策，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有争议的问题。所有让我们现在受害的糟糕观念，使得我们的政策如此有害的观念，都是由学术理论家们发展而成。

一位著名的西班牙学者谈到“群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我们使用这一术语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这种反叛不是由群众造成的：是知识分子造成的。而发展出这些学说的所有知识分子都不是来自群众中的人。马克思主义学说伪装成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好的观念，而只有无产阶级的头脑才创造出了社会主义，但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者，毫无例外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说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卡尔·马克思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他是律师的儿子。他不必打工就上了大学。他就象今天的富家子弟一样在大学里学习。后来，终其一生，他都由其朋友弗里德里奇·恩格斯资助。恩格斯是工厂主，照社会主义的观念，是最坏的一种“资产阶级”类型。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他是个剥削者。

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一切事情都是观念的结果，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需要与坏观念作斗争。我们必须与公共生活中所有我们厌恶的东西作斗争，以好观念取代错误观念。我们必须驳斥主张工会暴力的学说，反对没收财产、管制价格、通货膨胀，以及让我们受害的所有邪恶之事。

观念，只有观念，能够照亮黑暗。这些观念必须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我们必须让他们相信，这些是正确而非错误的观念。19世纪的伟大时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古典经济学家观念之产物，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巴斯夏和其他人观念之产物。

我们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以更好的观念来取代坏的观念。我希望而且相信，年轻一代会做到这点。我们的文明并非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所说的那样注定灭亡，我们的文明不会被莫斯科的精神所征服，我们的文明会而且必须生存下来。比统治现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观念更好的

观念，会让我们的文明生存下来，而年轻一代会发展这些更好的观念。

五十年前，世界上几乎没人有勇气开口支持自由经济，但现在，至少在世界上的某些先进国家，我们有一些机构，成了宣传自由经济的中心，比如，贵国的“经济自由传播中心”，它邀请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伟大的城市说上几句。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迹象。

关于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不能详谈。六次讲座对听众来说或许很多了，但尚不足以建立自由经济制度的完整学说，而且当然不足以驳斥过去五十年间就我们所讨论的经济学问题写作的所有谬论。

我非常感谢经济自由传播中心，让我有机会对如此优秀的观众演讲，我希望未来几年，贵国，以及其他国家，支持自由观念的人数会有显著增加。我自己对自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